

清代晚期的滿文避諱制度及其演變^{*}

張凌霄^{**}

摘 要

避諱制度在古代中國，既有特殊的文化意義，亦包含強烈的政治意涵。與中原王朝不同，清朝不但施行漢文避諱，亦對皇帝的滿文名進行避諱。以往學界普遍關注清中前期的避諱制度，較為忽視清代晚期的滿文避諱現象。本文通過考察滿文檔案和文獻，系統梳理了清代晚期的滿文避諱制度。咸豐以後，隨著漢文避諱進入「二名不偏諱」時代，滿文避諱也進入新的階段。與清代中前期相比，清代晚期的滿文避諱呈現出重視避諱字形、避諱範圍較小、重視程度減弱等特點。這種演變，反映出清廷所維持的多元化統治受到威脅和挑戰。

關鍵詞：清代晚期，滿文，避諱制度，制度演變

^{*} 本文在定稿過程中，承蒙三位匿名審查者及本刊編委會詳細審閱並惠賜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後，電子郵件信箱：zlingxiao93@126.com

一、前言

著名史學家陳垣 (1880-1971) 在《史諱舉例》中曾指出：「民國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謂避諱。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其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¹ 事實上，避諱之風不但盛行於古代中國，亦在東亞其他地區流行，成為該區域共用的文化符號與政治意識形態。因此，學界很早便從歷史學、版本學、文獻學等角度入手，研究避諱現象與政治、文化和社會秩序之間的關係。²

十六世紀末在東北亞崛起的女真—滿洲 (jušen-manju) 人，³ 雖在歷史上深受內陸亞洲 (Inner Asia) 因素之影響，但隨著清朝的壯大以及對前明故地的統治，統治集團逐漸接觸到大量漢文化因素，從而建立起一套兼具滿洲因素與中原特色的避諱制度。

關於清代避諱制度，特別是漢文的避諱情況，已有許多學者從不同方面進行了考察。⁴ 然而清代的避諱制度，並不僅限於漢文，亦包括作為「國書」(gurun i

¹ 陳垣，《史諱舉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序〉，頁1。

² 直到最近，仍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古代中國的避諱現象，顯示出避諱研究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強大的生命力。近年相關研究可參見潘銘基，〈《史記》與先秦兩漢互見典籍避諱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9（香港：2009），頁35-64；黃緯中，〈略論遼金的避諱〉，《史學彙刊》，26（臺北：2010），頁23-60；辻正博，〈唐代寫本における避諱と則天文字の使用——P.5523 recto の書寫年代について〉，《敦煌寫本研究年報》，10（京都：2016），頁437-448；聶激萌，〈六朝避諱考辨〉，《古典文獻研究》，1（南京：2018），頁222-234；卞仁海，〈出土先秦兩漢文獻中的避諱材料述論——兼論避諱的起源問題〉，《古代文明》，12.2（長春：2018），頁54-60；姜維東、鄭麗娜，〈遼代避諱問題研究〉，《史學集刊》，6（長春：2018），頁56-65；黃一農，〈從 e 考據看避諱學的新機遇：以己卯本《石頭記》為例〉，《文史》，2（北京：2019），頁205-222；馮先思，〈金代避諱補考〉，《歷史文獻研究》，2（揚州：2020），頁220-225；馮志弘，〈李賀父諱問題之禮法及流俗考——以韓愈〈諱辯〉及唐代嫌名律為中心〉，《成大中文學報》，69（臺南：2020），頁37-76；黃一農，〈大數據時代避諱學的新機遇：以清初為例〉，《數字人文》，4（北京：2022），頁1-35；竇懷永，〈論唐代避諱字形的區別性〉，《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3.9（杭州：2023），頁104-115；黃一農、吳國聖，〈清代對「胡虜夷狄」的文字避忌：以《宗忠簡集》、《楊忠愍集》、《平叛記》為例〉，《清華學報》，新54.1（新竹：2024），頁7-59；陳彬彬，〈秦莊襄王避諱及相關問題研究——以《呂氏春秋》和秦簡牘為中心〉，《文獻》，1（北京：2025），頁79-97。

³ 本文所使用之滿文轉寫法，為穆麟德轉寫法 (the Möllendorff system)。

⁴ 關於清代漢文避諱的代表性研究，參見張瑩，〈淺議清朝的避諱（國諱）制度〉，收入武斌主編，《多維視野下的清宮史研究》（北京：現代出版社，2013），頁110-132；趙增越，〈清代皇

hergen) 的滿文。⁵ 近年來，隨著新的滿文文獻不斷公佈，以及研究方法與路徑的轉型，已有學者注意到清代滿文避諱現象，並較為全面地考察了整個清代的滿文避諱情況。⁶ 安雙成、羅盛吉、李易航、春花等學者利用《御製增訂清文鑑》、《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初學滿文指蒙歌》等滿文文獻，以及《起居注》、《清實錄》、《大清會典事例》等漢文文獻，初步系統梳理了清代不同時期的滿文避諱制度。⁷ 洪曄雖未專門研究滿文避諱，但已嘗試利用滿文避諱字判斷滿譯本《生綃剪》(*šeng siyoo jiyan bithe*) 的成書年代。⁸ 鍾雪珂亦嘗試借助滿文避諱字，判斷東京外國語大學所藏《滿漢合璧音注成語對待》一書中滿文注音的時間。⁹ 吳雪娟對南京圖書館藏《繙譯三國志》的探討，雖側重於文獻學和版本學研究，但也特別注意到該書對康熙帝至道光帝「御名」用字改寫、挖補之情形。¹⁰ 李慧敏利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具體探討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滿文避諱實例。¹¹ 盧正恒則在利用《內閣大庫檔案》的基礎上，輔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譜牒檔案》、《滿漢經文成語》、《滿漢西廂記》等史料，系統性地討論了康熙至光緒時期滿文避諱的運用實

帝的起名與避諱》，《中國檔案》，5（北京：2015），頁 74-75；黃一農，《清代避諱研究：e 考據的學術實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Piotr Adamek, *A Good Son Is Sad If He Hears the Name of His Father: The Tabooing of Names in China as a Way of Implementing Social Value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193-203. 相關學術史回顧，可進一步參考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兼論乾隆朝避諱運用實例〉，《清華學報》，新 48.3（新竹：2018），頁 489-524。

⁵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避諱制度雖主要適用於漢文和滿文，但也涉及蒙文、藏文、察合台文等其他語言文字，反映出避諱文化對不同地域和族群所產生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不過較為遺憾的是，目前學界對清代避諱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漢文和滿文方面，清代其他語言文字中涉及皇帝御名避諱的情況仍有待研究。

⁶ 滿文避諱不限於御名，亦包括聖諱、王諱、憲諱、家諱等，惟限於篇幅及文章主旨，本文僅討論清代皇帝御名的避諱。

⁷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頁 1146；羅盛吉，〈清朝滿文避諱漫議〉，《滿語研究》，2（哈爾濱：2014），頁 17-23；李易航，〈清代滿文避諱制度淺談〉，《黑河學刊》，2（黑河：2019），頁 94-95；春花，〈清代皇帝御名避諱制及滿漢文避諱字譜〉，《滿語研究》，2（哈爾濱：2022），頁 23-34。安雙成在《滿漢大辭典》中附有〈清代帝諱表〉，但並未給出參考文獻來源。

⁸ 洪曄，〈故宮博物院藏滿文本《生綃剪》述考〉，《故宮博物院院刊》，8（北京：2021），頁 73-81。

⁹ 鍾雪珂，〈《滿漢合璧音注成語對待》的注音性質及價值——以與《兼滿漢語滿洲套話清文啟蒙》比較為中心〉，《古漢語研究》，1（長沙：2026），頁 145-156。

¹⁰ 吳雪娟，〈清內府重抄本《翻譯三國志》暨《四大奇書第一種》初探〉，《黑龍江民族叢刊》，6（哈爾濱：2024），頁 117-122。

¹¹ 李慧敏，《滿文譯本《四書》探賾（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20），頁 88-102。

例，並進一步考察了清朝統治者如何利用避諱制度來保持臣民的多元性，從而將該領域研究推進到新的高度。¹²

以上研究對梳理清代的滿文避諱歷史貢獻良多，但仍存在一定的缺憾和不足。首先，受「滿語衰落論」的深刻影響，¹³ 多數研究都側重清中前期（特別是康、雍、乾三朝）的滿文避諱，對清代晚期的滿文避諱制度關注較少，甚至有學者認為清代後期「有關皇帝滿文御名避寫的論旨甚少」。¹⁴ 其次，現有對清代晚期滿文避諱的討論，或失於粗疏，僅對官方規定的避諱方式進行簡單梳理，或缺少足夠的史料支撐，簡單認定某些時期的滿文避諱方式，以致存在不少不確之處。最後，現有研究多依據《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初學滿文指蒙歌》等個別文獻，忽視了大量清代官方檔案和民間文獻對滿文避諱的處理，從而遮蔽了滿文避諱制度所具有的「彈性」特徵，難以反映出清代晚期滿文避諱制度演變和實施的複雜情況。¹⁵

咸豐以後，隨著漢文避諱進入「二名不偏諱」時代，滿文避諱也開始僅避諱皇帝御名第二字，並呈現出新的特點。¹⁶ 本文利用清代檔案及其他滿文文獻，以皇帝御名避諱為核心，全面探討清代晚期的滿文避諱制度及其演變，並結合不同時期

¹² 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頁 489-524。

¹³ 「滿語衰落論」認為，清代中後期以來，滿語不斷衰落，絕大多數旗人不再掌握滿語、滿文，漢語、漢文成為旗人主要使用的語言文字。參見宮崎市定，《宮崎市定全集》第 14 卷（東京：岩波書店，1991），〈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頁 282-337；季永海，〈從接觸到融合（上）——論滿語文的衰落〉，《滿語研究》，1（哈爾濱：2004），頁 24-34；季永海，〈從接觸到融合——論滿語文的衰落（下）〉，《滿語研究》，1（哈爾濱：2005），頁 49-55；陳力，〈清朝旗人滿語能力衰退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8.4（北京：2011），頁 114-121；張凌霄，〈斷裂的「國語」：清帝國晚期的語言政治研究（1821-1911）〉（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19），頁 59-61；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The Manchu Language at Court and in the Bureaucracy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Leiden: Brill, 2024), pp. 61-62.

¹⁴ 春花，〈清代皇帝御名避諱制及滿漢文避諱字譜〉，頁 33。

¹⁵ 王寧在研究宋代避諱制度時指出，研究避諱制度不應只注重書面規定，還應「探究其運作中書面規定與實際執行之間的張力」，而目前多數滿文避諱研究恰恰缺少對滿文避諱制度運行的「彈性」研究。王寧，〈發現制度的「彈性」：作為過程的宋代避諱制度史之書寫與實踐〉，《湖北社會科學》，7（武漢：2025），頁 76。

¹⁶ 「二名不偏諱」，即指只避諱清朝皇帝御名的第二字，無須兩字都進行避諱。關於「二名不偏諱」之涵義，參見范志新，《避諱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頁 133-140；王新華，《避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頁 202、207。「二名不偏諱」語出《禮記·曲禮上》。關於「二名不偏諱」之義，自古爭議不斷，形成「不偏諱」與「不偏諱」之爭。乾隆帝（r. 1735-1796）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諭旨中言及「嫌名不諱」，並提到韓愈（768-824）「諱辯之言」，顯然認可「不偏諱」之論，反映出清代國諱由嚴趨寬之勢。參見卞仁海、王彥坤，〈也談「二名不偏諱」〉，《勵耘語言學刊》，2（北京：2017），頁 58-62；武秀成，〈段玉裁「二名不偏諱說」辨正〉，《文獻》，2（北京：2014），頁 175-186。

官方和民間的滿文避諱實例，分析這一時期滿文避諱的主要特點，並透過滿文避諱進一步思考清代晚期的政治文化和生態。

二、咸同兩朝滿文避諱制度

道光三十年 (1850) 正月十四日，道光帝 (r. 1820-1850) 駕崩，立皇四子奕訢 (i ju) 為嗣君，是為咸豐帝 (r. 1850-1861)。不久，咸豐帝頒佈諭旨，規定皇帝御名奕字無須改避，訢字則缺末筆寫作讠。¹⁷

咸豐以前，皇帝漢文御名的避諱方式雖各有不同，但兩字皆須避諱。例如，嘉慶帝 (r. 1796-1820) 名顥琰（原名永琰），顥字避寫作顥，琰字避寫作琰。¹⁸ 道光帝即位之初，曾為子孫行輩續增溥毓恒啟四字，並規定後世君主之名將來缺筆，依次寫作奕、載、溥、毓、恒、啟。¹⁹ 但道光帝在晚年又改變原先的想法，「念國家燕翼相承，宗支蕃衍，依次命名者，久而愈多」，援引乾隆時期的諭旨所提及的「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之言，規定後繼之君的御名，上一字無須避諱，只避諱第二字。²⁰

滿文避諱與漢文避諱既存在緊密的關聯性，又有其鮮明的獨特性。一方面，滿文避諱的出現與漢文避諱密不可分，且避諱方式（如避正呼、避嫌名等）原則上與漢文避諱相似。另一方面，滿文因其為拼音文字，故無法像漢字一樣廣泛採用缺筆或避寫，只得放寬避諱標準或另行規定避諱方式，乾隆十三年、四十一年諭旨，均對此有詳細論述。²¹ 因此，咸豐以後，隨著皇帝的漢文名只避諱第二字，滿文避諱也進入了較為寬鬆的時代，並產生了新的特點。

¹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 55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七日，頁 39。

¹⁸ 《新整宗人府》（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皇帝世系廟號避諱單〉，宣統，檔號 06-02-004-000287-0051。

¹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 31 冊，道光六年十二月初三日，頁 411。

²⁰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為避諱御名與其改眾人之名以避一人莫若改一人之名使眾無可避較為妥善將來繼體承緒者當永作用顥以綿作旻事〉，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檔號 03-18-009-000041-000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 51 冊，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頁 82。

²¹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為降諭嗣後繕寫清字如遇人名及二字相連者避諱若獨遇一字不必避諱事〉，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三日，檔號 03-18-009-000007-0003；〈為避諱御名與其改眾人之名以避一人莫若改一人之名使眾無可避較為妥善將來繼體承緒者當永作用顥以綿作旻事〉，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檔號 03-18-009-000041-0002。

關於咸豐帝漢文名的避諱情況，學界通常沒有爭議，但對滿文避諱，迄今為止卻討論不多，且存在一定爭議。部分學者認為，咸豐帝滿文名 $\mathfrak{ᠰᠠᠳᠤ}$ (i ju) 二字皆存在避諱，其中 i 避諱改寫為雙元音 $\mathfrak{ᠰᠠᠳᠤ}$ (ii)，ju 避諱改寫為 $\mathfrak{ᠰᠠᠳᠤ}$ (jū)。²² 但這種觀點與清代檔案和滿文文獻中的記載存在一定的出入。

首先，自康熙朝以降，皇帝滿漢文名的避諱方式雖有不同，但均須同時避諱，不存在漢文名避諱某字而滿文不避諱的情況，反之亦然。例如，乾隆帝漢文名為弘曆，弘以宏、紅等字代替，或諱缺末筆寫作弘；曆以歷代替，或諱缺末筆寫作曆。乾隆帝滿文名為 *hung li*，其中 *hung* 避寫為 *hūng*，*li* 避寫作 *lii*。其他各朝避諱亦是如此。至咸豐帝即位之初，遵照道光二十六年的諭旨，只避諱第二字，滿文與之相同。因此，朝廷對咸豐帝滿文名中的 i 並無避諱規定。此外，現存大量清代檔案也反映了這一事實。咸豐時期的滿文檔案中，奕訢 (1833-1898)、奕興 (1813-1858)、奕山 (1794-1878) 等人的滿文名均寫作 *i hin*、*i hing*、*i šan*，並未避諱 i。²³ 咸豐以後，i 同樣不曾避諱，如奕榕、奕燾、奕謨等名，均寫作 *i žung*、*i šu*、*i mo*。²⁴ 事實上，由於 i 是滿文中極為常見的詞彙，若一一避諱，將造成極大的不便，因此咸豐以後的滿文書籍中也無主動避諱 i 的情況。²⁵

²²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1146；甘德星，〈滿文羅馬字拼寫法芻議〉，收入閻崇年主編，《滿學研究》第 6 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頁 53。但上述學者並未給出咸豐帝之名 i 避寫作 ii 的史料依據，故盧正恒將其視為「自由心證」之產物。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頁 507。

²³ 《軍機處檔摺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歲滿給與官頂〉，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文獻編號 088843；《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奏請坐補盛京昭陵四品官摺〉，咸豐二年七月初四日，檔號 03-0206-4354-020；〈奏請放伊犁回子噶匪納齊伯克摺〉，咸豐二年三月初一日，檔號 03-0206-4349-002。

²⁴ 《軍機處檔摺件》，〈呈進貢馬由〉，光緒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文獻編號 170418；《宮中檔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為到任興京副都統六年期滿循例籲請陞見恭摺具奏〉，光緒十七年十月十六日，文獻編號 408008021；《軍機處檔摺件》，〈奏為載濤挑在乾清門行走謝恩由〉，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文獻編號 174042。

²⁵ 由於虛字 i 在滿文文獻中極為常見，故筆者難以列舉出咸豐以後所有滿文文獻中出現的 i 的書寫形式，以下僅舉幾例作為佐證。關於 i 在滿文中的功能，參見安雙成，〈滿語虛字 be、de、i、ci、deri 的用法〉，《滿語研究》，2（哈爾濱：1991），頁 39-43；崔鶴根，〈滿洲語의格，性，數에對해서：滿洲語文法（其二）〉，《語學研究》，12.1（首爾：1976），頁 1-16。關於晚清滿文文獻中 i 的書寫形式，可參見徐隆泰，《清文字法舉一歌》（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一年（1885）文寶堂刻本，編號 3305232099），頁 11b；萬福輯著，鳳山修訂，《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聚珍堂刻本，編號 3371345785），卷上，頁 3a；志寬、培寬，《清文總彙》（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荊州駐防繙譯總學刻本），卷 2，頁 1a。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清廷多次明確規定「二名不偏諱」，但咸豐之後，仍存在許多主動避諱奕字的案例，並在某種程度上獲得官方認可。例如，《凌霄·一士隨筆》記載，咸豐帝之名「奕」字，「『大』字一捺，須改為點」，寫作「奕」。²⁶ 又如，江蘇舉人沈奕齡（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拔貢沈奕豹（道光二十九年拔貢）為避諱咸豐帝御名，更名為沈錫齡、沈錫豹。²⁷ 直到光緒四年（1878），清廷才再次明確強調，奕字「毋庸避用」。²⁸

除此之外，吉林地區還曾一度存在針對咸豐帝滿文御名 i 的避諱現象。光緒十二年四月，吉林將軍衙門的一份咨文再次重申，咸豐帝之滿文御名，i 以 ii 字恭代，ju 以 jū 字恭代。²⁹ 但是，從吉林將軍衙門與所屬各城副都統、協領等之間往來的公文可以看到，在涉及吉林將軍奕榕（1824-1891）之名時，吉林地區的公文仍然正常書寫 i，並未因避諱寫作 ii。³⁰ 由此可見，咸豐以後，雖有局部地區對 i 的避諱作出規定，但在實際行文過程中，依舊不存在避諱 i 的實例。

其次，關於咸豐帝滿文名中第二字 ju，最初並未規定以 jū 改避，而是改以 ɗ (jo) 代替。正月十七日，咸豐帝頒佈漢文御名避諱諭旨，但當時尚未規定滿文避諱方式。次日（十八日），軍機大臣穆彰阿（1783-1856）等方奏請以 jo 代替 ju：

aliha bithei da amban mujangga sei gingguleme wesimbuhengge. sikse ejen i gebu fejergi nikan hergen be jailame araci acara hergen be emgeri hesei tacibume toktohuha be dahame. manju hergen inu giyan i emu adali gingguleme jailame araci acame ofi. amban be fejergi emu hergen be teisuleci dalbade tongki sindara be meitefi jo seme jailame araki. acanara acanarakū babe hesei tacibume toktohuha manggi, amban be dahame yabuk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seme. doro eldengge i gūsici aniya aniya biyai juwan

²⁶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 64 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頁 133。

²⁷ 奎潤等纂修，李兵、袁建輝點校，《欽定科場條例》下冊（長沙：岳麓書社，2020），卷 42，〈違式〉，頁 717。

²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 4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光緒四年正月初九日，頁 9。

²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吉檔案館編，《琿春副都統衙門檔案》第 123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吉林將軍衙門為滿漢公文內遇應敬避廟諱字樣等均應一體敬避事致琿春副都統衙門咨文〉，光緒十二年四月十六日，頁 158-161。

³⁰ 同前引，第 87 冊，〈寧古塔副都統衙門為鈔錄吉林將軍奕榕奏請陞見摺諭知照事致琿春協領札文〉，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頁 21-24。

jakūn de wesimbuhed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³¹

〔譯文〕大學士臣穆彰阿等謹奏。昨日聖主之名下一字應避寫之漢字，業已欽遵欽定，清文亦應一體敬避書寫。臣等遇下一字，去其側點，避寫作 jo。是否有當，俟欽定後，臣等遵行。為此謹奏。等因。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八日奏入，奉旨：依議。欽此。

然而這種避諱方式並未持續太久，當年七月，咸豐帝便認為 ju 改避為 jo，兩者區別不大，故又降旨以 jū 代替 ju：

doro eldengge i gūsi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sunja de hese wasimbuhanenge. mini gebu fejergi emu hergen be jailara de gemu jo seme araha, damu de jo
〔此處避諱，原應為 ju〕sere hergen de ilgara ba aku. ereci julesi gargata hergen i jo〔此處避諱，原應為 ju〕sere hergen, jū seme arakini, jo seme arara be baiburakū sehe.³²

〔譯文〕道光三十年七月初五日奉上諭：朕名下一字俱避寫為 jo 字，但與 ju 字並無區別。嗣後如遇單字 ju，著寫作 jū，無庸寫作 jo。欽此。

ju、jo、jū 雖為滿文中固有詞彙，但多用於還音漢字，如 ju（柷）、jū sy bithei boo（洙泗書院）等。³³ 因此，考察咸豐帝滿文避諱情況，主要以還音 ju 的漢字為主。例如，朱姓在咸豐以前，滿文均寫作 ju。滿文《明史》(*ming gurun i suduri*)中，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寫作 han i hala ju, gebu yuwan jang；滿漢《讀史論畧》(*hūlahā suduri i šošohon be leolehe bithe*)中，「興獻王子朱厚燧」寫作 hing hiyan wang ni jui ju ho dzung。³⁴ 但咸豐以後的檔案和書籍中，「朱」字則普遍遵照道光

³¹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奏報聖主清文名字用字避諱片〉，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八日，檔號 03-0205-4324-013。本文中出現的滿文翻譯，如無特別說明，均為筆者自譯。

³²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為避寫朕名下一字現俱書作 jo 字但與原 ju 字無所區別嗣後如遇單字著書作 jo 等情事〉，道光三十年七月初五日，檔號 03-18-009-000095-0003。

³³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866、890；胡增益主編，《新滿漢大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頁 872、879；Erich Hauer, *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 2., durchgesehen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herausgegeben von Oliver Corff*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 S. 284, 288.

³⁴ 佚名譯，滿文《明史·太祖本紀》，轉引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滿文古籍》（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 143；慶格、興德，《讀史論畧》（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槐堂刻本，編號 3305398809），卷下，頁 31b。

三十年諭旨避寫為 *jū*。例如，在《繙譯大學衍義》(*ubaliyambuha amba tacin i jurgan be badarambuha bithe*) 一書中，「近世大儒朱熹」寫作 *te i jalan i amba bithei niyalma jū hi*；滿文《穆宗實錄》稿本中，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甲辰條載「幅匪朱小五等被擒後，匪首朱芳茂，潛匿宿遷西南朱家圩內」，其中朱小五、朱芳茂、朱家圩分別寫作 *jū siyoo u*、*jū fang mao*、*jū giya šancin*；宣統年間的刻本《繙譯朱子家訓》(*ubaliyambuha jū wen gung booī tacihiyan*) 中，朱熹之名避寫作 *jū wen gung* (朱文公)，而乾隆年間的鈔本《繙譯朱文公家訓》(*ubaliyambuha jū wen gung ni booī tacihiyan*) 中，朱熹之名則寫作 *ju wen gung*。³⁵

此外，尚有部分旗人之名與咸豐帝滿文名同音，需要避諱。從道光三十年正月至七月，出現了旗人因避諱而更名的高潮。例如，營造司庫掌案索柱因「敬避御名」而更名為索順，武備院卿存柱為「恭避御名」更名存佑。³⁶ 這些姓名的漢文並不犯諱，更名顯然是為了避諱滿文御名。同年七月，雲貴總督程喬采(1783-1858)奏請騰越鎮總兵拴柱更名為拴德，但咸豐帝並未允准，並規定「嗣後凡有與朕名同音之字，均著毋庸改避」。³⁷ 咸豐三年(1853)二月上諭中，布特哈達幹爾總管珠勒格訥之名被寫作 *julgene*，即無避諱之處。³⁸ 至此，旗人因避諱大規模更名的浪潮才告結束。然而，這一諭旨並未完全杜絕旗人因避諱而改名的現象。例如，覺羅先鈴原名詳鑄(後更名先鑄)，因「鑄字與聖諱清漢同音」，故更名為先鈴；奉恩將軍扎昆珠也曾更名為扎倫布。³⁹ 這些現象表明，滿文避諱制度在施行時，情況遠比制度規定要更為複雜。

與官方相對嚴格、規範的避諱相比，民間對咸豐帝滿文名的避諱呈現出多樣

³⁵ 孟保譯，《繙譯大學衍義》(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咸豐六年(1856)武英殿刻本，編號3304247254)，「序」，頁5a；《內閣大庫檔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滿文本清穆宗實錄稿卷三三七〉，同治十一年七月，登錄號167157；德保譯，《繙譯朱子家訓》(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宣統二年(1910)荊州駐防廣化善堂刻本)，「序」，頁1a；德保譯，《繙譯朱文公家訓》(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1765)鈔本)，不分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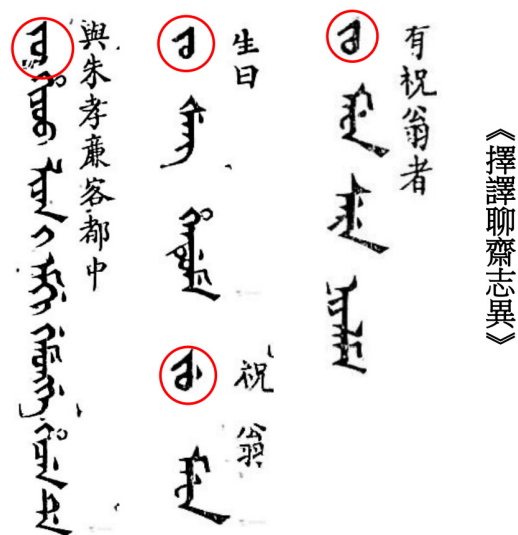
³⁶ 《內務府來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為呈請更名索順事〉，道光三十年二月十七日，檔號05-13-002-000713-0054；〈武備院為知照武備院卿存柱因下一字恭避御名准其更名存佑事致內務府〉，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檔號05-13-002-000712-0025。

³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55冊，道光三十年七月初五日，頁296。

³⁸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為乾清門二等侍衛索布多爾扎布著隨伊父布特哈達幹爾總管珠勒格訥前往軍營事〉，咸豐三年二月初六日，檔號03-18-009-000097-0003。

³⁹ 《新整宗人府》，〈為查得覺羅先鈴原名因與聖諱清漢同音更名先鈴及該覺羅生辰等取具近支保結呈報宗人府事〉，同治元年，檔號06-02-007-002109-0079；〈宗人府右司為鑲藍旗奉恩將軍扎昆珠更名扎倫布行各該處事〉，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檔號06-02-007-000558-0038。

性。以光緒時期刊刻的滿漢合璧《擇譯聊齋志異》(*sonjofi ubaliyambuha liyoo jai jy i bithe*) 為例，該書中多次出現「朱」、「珠」、「祝」等字，滿文原應寫作 *ju*，但為避咸豐帝名諱，均作了改動。然而其改避方式並不統一，既有以 *jū* 代替者，也有更改為 *jo* 者。例如，在〈畫壁〉(“*niruha fajiran*”) 一文中，「朱孝廉」被寫作 *jū hiyoo liyan*，而在〈水莽草〉(“*šui mang ts’oo orho*”) 中，「祝生」則寫作 *jo šeng*。⁴⁰ 更有甚者，在〈祝翁〉(“*ju mafa*”) 一則故事中，*ju* 的避諱也不統一，「祝翁」時而寫作 *jo mafa*，時而寫作 *ju mafa*，並未進行避諱（見圖一）。⁴¹



圖一：《擇譯聊齋志異》中對 *ju* 字的不同寫法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帝在熱河駕崩，遺命皇長子載淳 (*dzai šūn*) 繼位。次日，朝廷頒詔，規定同治帝 (r. 1861-1875) 漢文名載字無須避諱，淳字「用涓字改避」。⁴²

與咸豐帝時隔幾日才確定滿文避諱不同，當日（十八日）軍機大臣便奏請以 *ᠵ* (*son*) 字代替 *ᠵᠠ* (*šūn*) 字，並獲准施行：

⁴⁰ 扎克丹，《擇譯聊齋志異》（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二酉齋刻本，編號 3305268670），卷 1、4，頁 11a、76a。

⁴¹ 同前引，卷 6，頁 5a。

⁴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 11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頁 268。

ejen i gebui fejergi nikan hergen be jailame araci acara be amban be emgeri jailame arara hergen toktobuha be dahame, manju hergen be inu giyan i emu adali gingguleme jailame araci acame ofi. amban be fejergi emu hergen de teisuleci, golmin an〔疑筆誤，或應為 argan〕be meitefi šon seme jailame araki, holbohab hergen de teisuleci jailame arara be baiburakū obuki acanara acanarakū babe hesei tacibume toktobuha manggi, amban be dahame yabuk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seme. gubci elgiyengge i juwan emuci aniya nadan biyai juwan jakūn de wesimbuhede hese gisurehe songkoi obu sehe.⁴³

〔譯文〕聖主之名下一字應避寫之漢字，臣等已遵欽定避寫之字，清文亦應一體敬避書寫。臣等遇下一字時，截去長牙，避寫作 šon，遇連寫之字，無庸避寫。是否有當，俟欽定後，臣等遵行。為此謹奏。等因。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奏入，奉旨：依議。欽此。

但咸豐十一年七月所奏滿文避諱方案，並未施行多久，便與咸豐帝即位之初的滿文避諱方式一樣，被朝廷認為不妥，故於年底再次頒佈上諭，規定了新的避諱方式：

gubci elgiyengge i juwan emu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sunja de hese wasimbuhengge. mini gebu fejergi emu hergen be jailame de gemu šon seme araha, damu nikan hergen i asuru acanambi. ereci julesi gargata hergen šūn seme hergen teisuleci šuwen seme arakini, šon seme arara be baiburakū sehe.⁴⁴

〔譯文〕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諭：朕名下一字俱避寫作 šon，但與漢字甚不相符。嗣後遇單字 šūn，避寫作 šuwen，毋庸書作 šon。欽此。

清廷認為，以 šon 代替 šūn，雖在字形字音上均有所區別，但 šūn 所還音之漢字與淳字相去甚遠。以《欽定清漢對音字式》為例，šūn 對音順、瞬字，šon 則對

⁴³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檔案史志局編，《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滿文檔案選編》第 10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為將御名改避下一字事致阿拉善親王旗咨文〉，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頁 445-446。

⁴⁴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為前定避寫御名之下一字清文與漢字音義不符應另行避寫事〉，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檔號 03-18-009-000102-0004。

音純字，⁴⁵ 因此清廷決定改以 *ᡥ* (*šuwen*) 字代替 *šūn*。次年十月，又因舜帝之名滿文亦寫作 *šūn*，而虞舜為萬代祖述，不應避諱，故再次頒佈上諭，規定凡是滿文還音舜帝之名時，均無須避寫：

yooningga dasan i sucungga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ilan de hese wasimbuhanngge. mini gebu fejergi emu hergen onggolo emgeri hese wasimbuᡥi šuwen seme arabuᡥi, amban irgen i gingguleme jailara gūnin de acanahabi. gūninci ioi gurun i šun han oci, tumen jalan i da arafi fisembuci acambi, ereci julesi bithe cagan be banjibume acara jai bithei hergen i yarume baitalara de gemu šuwen seme halame acara be baiburakū, ereni gingguleme wesihulere tuwabukini sehe.⁴⁶

〔譯文〕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奉上諭：朕名下一字前已降旨書作 *šuwen*，俯協臣民敬避之意。因思虞舜，乃萬代所宜祖述，嗣後纂修書籍及引用文字，均無庸改寫作 *šuwen*，以示欽崇。欽此。

由於同治帝滿文名中 *šūn* 字基本只用於漢字還音，因此考察其滿文避諱情況，仍應以還音 *šūn* 的漢字為主。由清代檔案和文獻可知，淳、醇、順等字，滿文均寫作 *šūn*，故同治以後均須避諱，而春、純等字漢文字音雖然近似，但滿文卻寫作 *cūn*、*šon*，例如呂逢春（生卒年不詳）之名寫作 *lioi fung cūn*，楊遇春（c. 1760-1837）之名寫作 *yang ioi cūn*，顧純祖（c. 1680-1739）滿文寫為 *gu šon dzu*，故無須避諱。⁴⁷ 但也有例外，如同治元年宗室載春（生卒年不詳）更名為載眷，⁴⁸ 顯然與漢文避諱無關，而是為了避諱滿文御名。

在實際避諱中，情況更為複雜，不可一概而論。以「順」字為例，同治以前，

⁴⁵ 傅恒等纂，《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道光十六年（1836）武英殿重刊本，編號故殿 015904），〈第四字頭〉，頁 21a。

⁴⁶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為清文舜帝之名著不必避諱事〉，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檔號 03-18-009-000103-0004。

⁴⁷ 巴泰等纂修，《大清世祖章皇帝滿文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20，順治二年八月壬午，編號 113000029，頁 6a；昆岡等續修，滿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內府寫本），卷 602，〈兵部六十一·議敘通例〉，編號 172526112X，頁 18b；慶桂等纂修，《大清高宗純皇帝滿文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94，乾隆四年六月壬午，編號 113000217，頁 29a-b。

⁴⁸ 《舊整宗人府》（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為近支頭族應得同治元年歲貢宗室載春更名載眷出具圖片事〉，同治元年九月，檔號 06-01-001-000444-0120。

滿文均寫作 *šūn*，如康熙朝官員尚之順 (?-1731)，滿文寫作 *šang jy šūn*，乾隆朝商人林順泰，滿文寫作 *lin šūn tai*。⁴⁹ 同治以後，為避諱皇帝御名，順均由 *šūn* 改寫為 *šuwen*。如在《穆宗毅皇帝聖訓》中，「順天南路」滿文寫作 *šuwen tiyan i julergi jugūn*，「廣平順德」滿文寫作 *guwang ping šuwen de*。⁵⁰ 值得注意的是，旗人姓名中，大量包含「順」字，但這些名字多從滿語而來（如特依順保 (*teišumboo*) 為黃銅之意⁵¹），且寫法通常與漢人姓名中對音之 *šūn* 不同（如文順寫作 *wenšuwen*⁵²），加之連寫時本無須避諱，因此基本不涉及避諱問題。

相較於「順」字，滿文對「醇」字的避諱要略顯複雜。咸豐十一年十月，同治帝即位後不久，時任順天府府尹董醇 (1807-1892) 便以其名「與御名字音相同，字義亦復相近」為由，奏請改名為董恂，並獲批准。⁵³ 這也意味著董醇之名在更改後，不存在滿文避諱問題。然而，光緒十二年湖南巡撫卞寶第 (1824-1893) 奏請知縣江良醇更名時，朝廷卻認為「醇字並非應行敬避字樣」，並沒有允准。⁵⁴ 在這種情況下，便出現漢文不改而滿文避諱的現象。例如，道、咸時期的官員徐澤醇 (1787-1858)，其名滿文原寫作 *sioi je šūn*，光緒時期所修《欽定大清會典事例》(*hesei toktobuha daicing gurun i uheri kooli i baita hacin bithe*) 中，已改寫為 *sioi je šuwen*（見圖二）。⁵⁵

⁴⁹ 《宮中檔滿文奏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報鄭家莊行宮工程銀兩摺〉，康熙六十年十月十六日，文獻編號 41200076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中琉歷史關係檔案·乾隆朝》第 5 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8），〈大學士陳世倌等為頒賞琉球國貢使物品事題本〉，乾隆十九年二月初五日，頁 40。

⁵⁰ 寶鋆等纂修，滿文《大清穆宗毅皇帝聖訓》（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武英殿刻本），卷 2，〈聖德二〉，編號 1046375539，頁 65a；卷 11，〈敬天〉，編號 1046382489，頁 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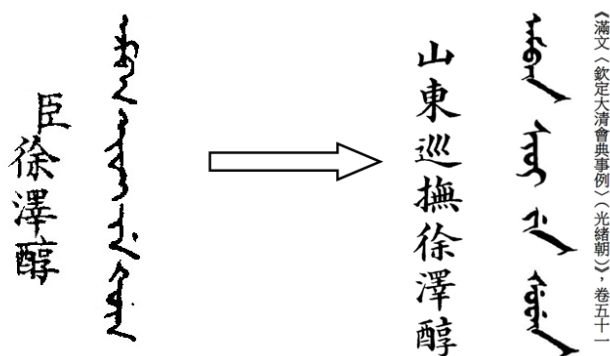
⁵¹ 奕賡著，雷大受校點，《佳夢軒叢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卷上，〈清語人名譯漢〉，頁 309。

⁵² 《宮中檔奏摺》，〈奏陳三年期滿懇請陞見〉，光緒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文獻編號 408005980。

⁵³ 《內閣大庫檔案》，〈順天府為府尹董醇改名由〉，咸豐十一年十月十九日，登錄號 143580。

⁵⁴ 世續等修，《德宗景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5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33，光緒十二年十月丁丑，頁 148-149。

⁵⁵ 《內閣大庫檔案》，〈四川總督為鬥毆殺人擬絞事〉，咸豐元年七月十二日，登錄號 015762；昆岡等續修，滿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51，〈吏部三十五·漢員開列〉，編號 1725197626，頁 42a；昆岡等續修，《清會典事例（光緒朝）》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 51，〈吏部三十五·漢員開列〉，頁 652。



圖二：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對「醇」šūn 的避諱

三、光緒朝滿文避諱制度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去世。由於其未有子嗣，故在兩宮皇太后的主導下，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 (dzai tiyan, 1871-1908) 被立為嗣皇帝，承繼文宗大統。依據慣例，次日朝廷頒佈上諭，規定新皇帝漢文名上一字無庸避諱，下一字則缺寫末筆書作湉。⁵⁶ 同日，清廷也頒佈上諭，規定了光緒帝 (r. 1875-1908) 滿文名的避諱方式：

yooningga dasan i juwan ilan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ninggun de hese wasimbuhange. mini gebu be jailame arabure de fejergi emu hergen be teisuleci tiyañ seme jailame arabuki seme toktobuha. erebe bireme ulhibume selgiyefi, ereci yaya holbome araci acaca toktobuha manju gisun be an i fe songkoi arakini, gargata hergen arara de mini gebui fejergi emu hergen be teisuleci, tiyañ seme jailame arakini sehe.⁵⁷

〔譯文〕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旨：遇朕名下一字，定為避寫作 tiyañ。著通行曉諭，嗣後凡遇應行聯寫之已定清語，仍照舊書寫。若遇書寫單字御名下一字，避寫作 tiyañ。欽此。

⁵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 24 冊，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頁 406。

⁵⁷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為通諭嗣後凡遇聯寫成語仍照舊書寫如遇書寫單字時於御名下一字避寫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檔號 03-18-009-000109-0004。

由滿文上諭可知，光緒帝滿文名避諱仍同咸豐、同治二帝一樣，只避諱下一字，上一字不避諱。但其避諱方式卻與此前不同，由原先用拼寫不同的另一字恭代御名，改為直接在滿文名 ᡩᠠᡳᠨ (tiyan) 字左側添加一點寫作 ᡩᠠᡳᠨᠠᠨ (tiyañ)，方式更為簡便。實際上，這種通過加點避諱的方式並非光緒朝首創，而是有先例可循。乾隆六十年九月，永琰 (yung yan) 被立為皇太子後，乾隆帝考慮到 yan 較常使用，為免天下將來避諱的麻煩，特頒諭旨，將其名 ᡩᠠᡳᠨ (yan) 添加一點改名為 ᡩᠠᡳᠨᠠᠨ (yañ)：

abkai wehiyehe i ninjuci aniya uyun biyai ice ninggun de hese wasimbuha.
kooli de hūwangdi i gebu geren i jailame araci acarangge. ishun aniya uthai
dasan be afabure be dahame, te hūwang taidzi i gebu i fejergi hergen oci fe
manju gisun, geli ta seme baitalarangge, jailame be baiburakū. mini gūsin de
hūwang taidzi i gebu fejergi hergen be emu tongki sindafi yañ seme arabusiki.
ereci Julesi holbome arara gargan hergen arara de yan seme hergen be jailame
be baiburakū, kemuni fe songkoi yan seme arasiki sehe.⁵⁸

〔譯文〕乾隆六十年九月初六日奉旨：向例皇帝之名理應避寫。明年即行歸政，今皇太子之名下一字，乃舊清語，亦為常用之字，無庸回避。朕思皇太子之名下一字，添加一點書作 yañ，嗣後單寫連寫 yan 字，俱毋庸回避，仍照舊書作 yan。欽此。

此後，清廷規定道光帝滿文名應如何避諱時，亦採取了加外點的方式，將 ᡩᠠᡳᠨ (min) 寫作 ᡩᠠᡳᠨᠠᠨ (miñ)。⁵⁹ 這種避諱方式雖未被咸、同兩朝繼承，卻成為光、宣時期官方唯一認可的避諱方式。

光緒帝滿文名的避諱方式雖與咸、同二帝不同，但光緒朝亦繼承了同治帝滿文名遇舜帝之名不避諱的傳統，於光緒元年頒佈上諭，規定凡是遇到「天」字還音，滿文均照舊寫為 tiyan，無須避諱：

⁵⁸ 同前引，〈為向例皇帝之名理應避寫今皇太子顥琰清語名毋庸避寫著在第二字旁加一點事〉，乾隆六十年九月初六日，檔號 03-18-009-000055-0004。安雙成、春花等認為，嘉慶帝之名，用 yañ 避諱本名 yan，有誤。見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1146；春花，〈清代皇帝御名避諱制及滿漢文避諱字譜〉，頁 33；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頁 499-500。

⁵⁹ 趙煥林主編，遼寧省檔案館編，《黑圖檔·嘉慶朝（下）》第 32 冊（北京：線裝書局，2016），〈盛京戶部侍郎等為奏准書寫皇上滿文名字時在旁邊添一點避諱事咨盛京內務府〉，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頁 242-243。

badarangga doro i sucungga aniya juwan biyai juwan juwe de hese wasimbuhanngge. mini gebu fejergi emu hergen onggolo emgeri hese wasimbufi, yaya manju bithei dorgide tiyañ seme hergen i jergi hergen mudan teisuleci, gemu dalbai tongki be nonggime arabufi, ambasa irgesei gingguleme jailara gūnin de acanahabi. gingguleme baicaci yooningga dasan i sucungga aniya juwan biyade ioi gurun i šūn han oci temen jalan i da arafi fisembuci acambi, ereci julesi, bithe cagan be banjibume arara jai bithei hergen i yarume baitalara de, gemu halame arara be banjiburakū seme hese wasimbuha bihe. ede gūnici, dulimba be deribure ten be iliburengge damu abka amba, mini gebu fejergi emu hergen, aika emu adali jailame arabuci, mini dolo ambula elhe baharakū. ereci julesi manju bithei dorgide abka seme tiyan sere hergen teisuleci, dalba tongki be nonggime arara be baiburakū, unenggi ginggun be ilekilekine, terei funcehe mudan acabure hergen oci, an i yooningga dasan i juwan ila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ninggun i wasimbuha hese be dahafi jailame arakini se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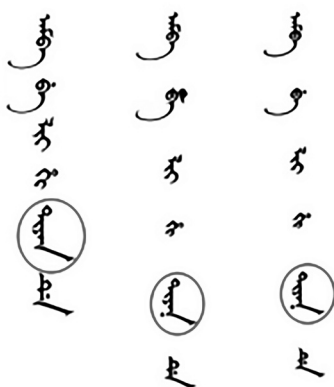
奉旨：朕御名下一字前已有旨，凡清文內如遇天字等音，均著加寫外點，俯協臣民敬避之心。恭查同治元年十月奉有虞舜乃萬代祖述，嗣後纂修書籍及文字引用，均毋庸改寫之旨。因念建中立極，唯天為大，朕之御名下一字若一律避寫，朕心實有未安。嗣後凡清文內遇有天字還音，毋庸加寫外點，以昭誠敬，其餘還音字樣，仍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諭旨避寫。欽此。⁶⁰

同治帝滿文名遇舜帝之名無須避諱，但這種情況較為少見，故絕大部分還音 šūn 字者，仍須嚴格避諱。但「天」字與之不同，大量人名、地名中包含天字，而「天」字又是滿文 tiyan 對音的主要漢字之一，這就導致大量涉及 tiyan 字的檔案和書籍都無須避諱。例如，清末部分檔案中涉及「天主」(tiyan ju)、「天主堂」(tiyan ju tanggin) 等詞語，寫作滿文時，均未避諱，直接寫為 tiyan。⁶¹ 但也存在例

⁶⁰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為嗣後清文內凡遇有天字及與朕之御名下一字同音字母庸加寫外點事〉，光緒元年十月十二日，檔號 03-18-009-000110-0004。

⁶¹ 吳忠良、趙洪祥主編，《清代伯都訥滿漢文檔案選輯》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伯都訥副都統衙門為發給天主堂承領捕魚執照事咨天主堂文〉，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頁 5。

外情況。晚清外交文書中常將外國總統稱為「伯理璽天德」，滿文原寫作 *be lii hi tiyan'de*。如同治六年十二月清朝致美國國書中，即寫道：*amba daicing gurun i amba hūwangdi fonjime amba mei gurun i amba be lii hi tiyan'de sai yūn*，但光緒以後，為避皇帝名諱，伯理璽天德均改寫為 *be lii hi tiyañ'de*（見圖三）。⁶²



圖三：同治、光緒年間國書中滿文 *tiyan* 的不同寫法

對國內公文和書籍而言，遇「天」字還音，也多遵照光緒元年的諭旨不避諱。以地名為例，光緒時期的滿文書籍中，*tiyan jin*（天津）、*fung tiyan*（奉天）、*tiyan men*（天門）等，因還音「天」字，均未進行避諱。⁶³ 相反地，*lan tiyañ*（藍田）、*da tiyañ*（大田）、*ho tiyañ*（厚田）等地名，均加外點進行了避諱。⁶⁴ 對於人名而言，滿文避諱的情況亦是如此（見表一）。

⁶² 〈蒲安臣國書〉（“Letter of Credence for Anson Burlingame”）（美國國家檔案館藏），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編號 147969846；〈伍廷芳國書〉（“Letter of Credence for Wu Tingfang”）（美國國家檔案館藏），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編號 171486425。

⁶³ 寶鋆等纂修，滿文《大清穆宗毅皇帝聖訓》，卷 2、8，〈聖德二〉、〈聖治一〉，編號 1042502889、1042502889，頁 65a、50a；昆岡等續修，滿文《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朝）》（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內府寫本），卷 15，〈戶部·尚書侍郎職掌三〉，編號 1676516999，頁 2a。

⁶⁴ 昆岡等續修，滿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276、593，〈戶部一百二十五·調恤·貸粟一〉、〈兵部五十二·綠旗營制〉，編號 1725225018、1725246651，頁 55a、5b；萬福輯著，《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原序」，頁 4b。

表一：光緒朝滿文人名避諱情況

文獻名稱	內容	避諱	史料來源
滿文《穆宗聖訓》	tiyañ hing su 田興恕	是	卷 47，頁 57a
滿文《穆宗實錄》稿本	lio fu tiyañ 劉福田	是	卷 337，頁 7
滿文《穆宗實錄》稿本	li hi tiyañ 李西田	是	卷 337，頁 7
滿文《大清會典》	jang fu tiyañ 張福田	是	卷 35，頁 58a
滿文《大清會典事例》	yong cūn jeo i da tiyañ hiyan 永春州大田縣	是	卷 593，頁 5b
滿文《大清會典事例》	tiyañ coo gui 田朝貴	是	卷 602，頁 44a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	yoo tiyañ 姚田	是	03-0209-4547-017
滿文《穆宗實錄》稿本	lii tiyañ gui 李天貴	是	卷 337，頁 7
滿文《大清會典》	ho tiyan siyang 何天祥	否	卷 35，頁 58b
《擇譯聊齋志異》	tenteke tiyan heng ni sunja tanggū niyalma aika wacihyame mentuhun bihebi. 彼田橫五百人，豈盡愚哉！	否	卷 16，頁 44a

然而我們也可發現，即便在《穆宗毅皇帝實錄》稿本和《大清會典事例》這樣極具權威性的官方書籍中，仍存在無須避諱而避諱者，如李天貴被寫作 *lii tiyañ gui*，也存在應避諱而未避諱者，如羅田縣學被寫作 *lo tiyan hiyan i tacikū*。⁶⁵ 此外，在地方政府和民間所編印的滿文書籍中，避諱不規範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在《滿蒙漢合璧教科書》(*manju monggo nikan ilan acangga šu i tacibure hacin i bithe*)中，便存在將「田仲」譯為 *tiyan jung* 並未進行避諱的情況。⁶⁶ 光緒時期刊印的《擇譯聊齋志異》一書，對咸豐、同治二帝的御名均有避諱，但遇「田」(*tiyan*)字時，多未避諱，仍舊寫作 *tiyan ci lang* (田七郎)、*tiyan heng* (田橫)。⁶⁷ 相反地，光緒年間刊刻的《對音輯字》，則未遵循光緒元年之諭旨，仍以 *tiyañ* 避諱「天」字。⁶⁸

⁶⁵ 《內閣大庫檔案》，〈滿文本清穆宗實錄稿卷三三七〉，同治十一年七月，登錄號 167157；昆岡等續修，滿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 376，〈禮部八十七·學校〉，編號 1725233460，頁 3b。

⁶⁶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滿蒙漢合璧教科書》第 5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二課·田仲〉，頁 7。

⁶⁷ 扎克丹，《擇譯聊齋志異》，卷 18、16，〈田七郎〉、〈連城〉，頁 1a、44a。

⁶⁸ 志寬、培寬，《對音輯字》（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六年（1890）繙譯總學刻本），卷下，頁 32b。

最為特殊者當屬光緒末年的一份抄本《繙譯古文觀止》(*ubaliyambuha julgi šu fiyelen i toktoho be tuwaha bithe*)。該抄本序言部分寫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皋月二十六日，定軒孟保謹識」(*badarangga doro i orin uyuci aniya sahaḥūn gūlmahūn morin biyai orin ninggun de, ding siowan mengboo gingguleme ejeme araha*)，可見此抄本應為光緒末年所寫。然而在該抄本中，並未對咸豐、同治、光緒三帝的滿文御名進行避諱。例如，在卷五〈遊俠列傳序〉(“*faršatai yabure antaha i faidangga ulabun i šutucin*”)中，「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一句，朱家、田仲分別寫作 *ju giya*、*tiyan jung*，均未避諱。⁶⁹ 在同卷的〈滑稽列傳序〉中，「語在〈田敬仲世家〉中」一句，田敬仲亦止寫作 *tiyan ging jung*。⁷⁰ 卷八〈柳子厚墓誌銘〉中，「順宗即位」寫作 *šūn dzung han hergen siraha manggi*，並未避諱同治帝之名。⁷¹ 由此可見，民間對皇帝滿文御名的避諱，遠不如官方嚴格和規範。

四、宣統朝滿文避諱制度

關於宣統帝 (r. 1908-1912) 滿文名的避諱，是清代滿文避諱研究中最為薄弱的一環。大多數涉及清代晚期滿文避諱的研究，由於所依據的《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初學滿文指蒙歌》等文獻皆止於光緒時期，因此對宣統帝滿文名的避諱情況不甚了了。少數學者認為，宣統帝滿文名無須避諱，或認為溥儀之名以 *ii* 恭代 *i*，其他學者在涉及此問題時，則往往忽略不談。⁷² 故宣統朝滿文避諱制度是否存在，仍須進一步探究。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緒帝去世。同日，由於德宗無子嗣，奉慈禧皇太后懿旨，醇親王載灃 (1883-1951) 的兒子溥儀被立為嗣皇帝。次日，依歷朝先例，軍機大臣等奏請對宣統帝之名避諱：

臣等恪遵成憲，擬將御名上一字仍舊書寫，毋庸改避，其下一字，敬缺

⁶⁹ 孟保譯，《繙譯古文觀止》（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抄本，編號 3304247270），卷 5，頁 13b。

⁷⁰ 同前引，頁 5b。

⁷¹ 同前引，卷 8，頁 5a。

⁷² 李易航，〈清代滿文避諱制度淺談〉，頁 94-95；盧正恒，〈清代滿文避諱〉，頁 502；羅盛吉，〈清朝滿文避諱漫議〉，頁 20；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1146；春花，〈清代皇帝御名避諱制及滿漢文避諱字譜〉，頁 24。

一撇，書作儀字。如蒙俞允，遵當恭擬清漢諭旨呈進，伏候欽定。謹奏。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欽此。⁷³

同日，清廷頒佈上諭，規定宣統帝漢文名第二字諱缺末筆，寫作儀。那麼，宣統帝的滿文名是否也是如此避諱？

在討論宣統帝滿文名避諱前，首先應釐清宣統帝的滿文名為何。由於宣統帝統治時間極短，而其滿文名在各種文獻中又幾乎不可能出現，因此多數學者根據其漢文名，推斷滿文名應寫作 ᡩᠠᡳ (pu i)。⁷⁴ 這種看法雖無確切史料支撐，卻也有一定道理。首先，根據《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對音輯字》等書，與儀字字音相近、相同的伊、怡、宜、義等字，滿文均寫作 i。⁷⁵ 其次，在宣統以前的滿文文獻中，凡人名中帶有儀字，滿文均翻譯為 i，如順治朝張鳳儀 (jang fung i, 1623-?)、雍正朝勵廷儀 (li ting i, 1672-1736) 等，與儀相近字音之人名，亦寫作 i，如宗室綿宜 (miyan i, 1828-1898)。⁷⁶ 最後，最為有力的輔證是輔國將軍載堪 (1818-1861) 之子、三等奉國將軍溥儀（宣統時因與「皇帝御名同名」被改名）之名，其漢文名與宣統帝相同，滿文則寫作 pu i，⁷⁷ 與猜測中宣統帝的滿文名相同。

然而，若宣統帝滿文名為 pu i，則避諱將極其困難。誠如前文所言，i 在滿文中是極其常見的格助詞（一般寫作 ᡳ ），除充當屬格、工具格、格語尾等外，尚有他（它）、他們（它們）之意。⁷⁸ 在所有的滿文書寫中，無論是公文抑或書籍，i 均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若對 i 避諱，將使滿文難以連詞成句。因此

⁷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 34 冊，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頁 250-251。

⁷⁴ 李易航，〈清代滿文避諱制度淺談〉，頁 95；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1146。

⁷⁵ 傅恒等纂，《欽定清漢對音字式》，〈第一字頭〉，頁 2a；志寬、培寬，《對音輯字》，卷上，頁 1a-b。

⁷⁶ 巴泰等纂修，《大清世祖章皇帝滿文實錄》，卷 41，順治五年十二月庚戌，編號 113000037，頁 43b；《宮中檔滿文奏摺》，〈奏請揀選補授漢教習員缺〉，雍正元年五月十四日，文獻編號 412000547；《軍機處檔摺件》，〈奏謝照舊供職恩由〉，光緒十七年二月三十日，文獻編號 171257。

⁷⁷ 《內閣禮科題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為奉旨承襲奉國將軍溥儀照例添撰誥命等事宜事〉，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檔號 02-01-005-023549-0021；《新整宗人府》，〈為已故奉國將軍溥儀與皇帝御名同名傳知該學長速即將該宗室更名事〉，宣統，檔號 06-02-004-000152-0073。

⁷⁸ 季永海，《滿語語法（修訂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頁 208-209；河內良弘、清瀨義三郎則府編著，《滿洲語文語入門》（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頁 67、70-71；Erich Hauer, *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 2.*, S. 252.

迄今為止，在滿文公文和書籍中，均未發現對 i 進行避諱的實例。此外，宗室中奕字輩成員，其名也未避諱。例如，慶親王奕劻 (1838-1917)，其滿文名為 i kuwang，直至去世，其墓碑所刻御製文仍舊寫作 i kuwang，並無任何改動。⁷⁹

然而，由歷代慣例和軍機處所奏可知，宣統帝御名不但漢文需要避諱，滿文亦須避諱。因此，考察宣統帝滿文名的避諱情況，首先應檢視其滿文名為何，進而再確定滿文避諱的方法。

關於「溥儀」名諱的滿文寫法，儘管現存史料極少提及，但仍有跡可循。宣統帝生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隨後被「命名為溥儀」，其中「儀」明確寫作雙元音 ʡ (ii)，⁸⁰ 與三等奉國將軍溥儀的滿文名 pu i 並不相同。此外，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廷宣佈醇親王之子溥儀繼承皇位，該遺詔之滿文本亦明確提到溥儀的滿文名為 pu ii。⁸¹

由此可見，毫無疑問，宣統帝滿文名當為 ʡ. ʡ (pu ii)，其中「儀」滿文寫作雙元音 ii，而非之前認為的格助詞 i。這種命名方式在清代雖較為少見，但仍有先例可循。乾隆帝第十一子永瑆 (1752-1823) 的次子，其名綿懿 (1771-1809)，滿文即寫作 miyan ii 而非 miyan i。⁸²

因此，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滿文上諭，專門規定了 ii 的避諱方式：

badarangga doro i gūsin duici aniya juwan biya orin juwe de hese
wesimbuhangga, mini gebu be jailame arabure de fejergi emu hergen be
teisuleci ij seme jailame arabumbi seme toktobuha erebe bireme ulhibun
selgiyesi. ereci Julesi yaya holbome araci acara toktobuha manju gisun be an i
fe songkoi arakini gargata hergen arara de mini gebu fejergi emu hergen be
teisuleci ij seme jailame arakini hese.⁸³

⁷⁹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90 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奕劻墓碑〉，頁 131。

⁸⁰ 《內務府來文》，〈為醇親王載灃之第一子著命名溥儀事〉，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檔號 05-13-002-000351-0054。

⁸¹ 佚名，《繙譯存稿》（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抄本），〈遺詔〉（“delhentuhe selgiyere hese”），不分頁。

⁸²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奏將伊女指給綿懿阿哥為妻謝恩摺〉，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檔號 03-0190-2957-038。

⁸³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為嗣後御名下一字凡遇連寫成語仍照舊書寫如遇書寫單字時應行避寫事〉，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檔號 03-18-009-000126-0007。

〔譯文〕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旨：如遇避寫御名下一字，定為避寫作 *ii*。著通行曉諭，嗣後凡遇應行聯寫之已定清語，仍照舊書寫，如遇書寫單字御名下一字，避寫作 *ii*。欽此。

這道滿文上諭被譯為漢文後，亦載於《起居注》中：

又奉旨：凡遇避寫御名下一字，應避寫定作 *ii* 儀。著通行曉諭，嗣後凡應行聯寫之清語，著仍照舊書寫，遇書寫單字御名下一字，避寫作 *ii* 儀。⁸⁴

由此可以確定，宣統帝滿文名原為 *pu ii*，上一字無須避諱，下一字沿用光緒帝的避諱方式，在左側加點寫作 *ii*。

與格助詞 *i* 不同，雙元音 *ii* 在滿文中極其罕見。甘德星認為，雙元音 *ii* 由蒙古文 *yi* 演變而來，可視為連體字，既可出現於字音之後，也用於拼寫梵文中的長 *i* 音。⁸⁵ 此外，*ii* 還有嘲笑般吶喊或哭聲之意。⁸⁶ 但總體而言，*ii* 在日常公文及書籍中出現的機率極低，加之只有單寫時需要避諱，因此極少有滿文避諱的實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誤使人們認為宣統帝滿文名無須避諱。不過，仍有案例可能與滿文避諱有關。光緒三十四年，宗人府額外筆帖式溥詒 (1893-1966) 更名為溥鐸，⁸⁷ 檔案雖未言明其改名原因，但考慮到同時期許多漢官姓名中含有詒字卻並未更名，溥詒很可能是為了避諱滿文御名而改名。

五、清代晚期滿文避諱制度的特點

康熙以前，由於清朝統治集團以滿、蒙貴族為主，大量漢制處於草創階段，並不完善，因此當時避諱制度尚不嚴格，對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生活也影響不大。但隨

⁸⁴ 徐致祥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光緒朝》第 80 冊（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7），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頁 40409。

⁸⁵ 甘德星，〈滿文羅馬字拼寫法芻議〉，頁 53-54。

⁸⁶ Erich Hauer, *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 2., S. 252, 288.

⁸⁷ 《舊整宗人府》，〈為呈報宗人府額外筆帖式溥詒更名溥鐸事〉，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檔號 06-01-001-000766-0007。

著清朝政權的鞏固以及典章制度的完善，康熙以後，避諱制度日趨嚴格。⁸⁸ 特別是康、雍、乾時期，因避諱問題而產生的文字獄及政治案件接連不斷，避諱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治環境的映射，這也使得學界普遍對這一時期的滿文避諱更感興趣。

清中後期，隨著政治制度的因循守舊以及滿漢關係的穩定，避諱不再是影響政治生態的重要因素，加之學界普遍認為嘉、道以後，滿文日益衰落，所以對這一時期的滿文避諱制度關注無多。然而通過上文考證可知，直至清末，滿文避諱仍然存在，且隨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因此考察咸豐至宣統時期的滿文避諱的演變及特點，並由此窺見清代晚期部分政治生態情況，並非沒有價值和意義。

縱觀咸、同、光、宣四朝的滿文檔案和文獻，可以看到清代晚期滿文避諱制度所呈現的特點。

首先，同清中前期相比，咸豐以後皇帝滿文名的避諱，首先重視避諱字形，其次才重視避音。清代中前期，雖然滿文避諱也重視避諱字形，但對字音的避諱尤為突出。以康熙帝名諱為例，其滿文名為 *hiowan yei*，*hiowan* 避寫為 *siowan*，便涉及尖、團音之區分。⁸⁹ 故乾隆十三年諭旨明確指出，與漢文避諱另用他字不同，滿文通過「另取音聲相似者用之」來避諱。⁹⁰ 這種「另取音聲相似者」的避諱方式被認為一直持續至清末，⁹¹ 但實際上在咸豐以後已逐漸發生改變。

咸豐帝之滿文名原避寫為 *jo*，後改避寫作 *jū*。這裡尚難看出滿文避諱以避音或避字形何者為主。但同治帝的滿文名避諱，已凸顯出避諱字形逐漸開始佔據上風。同治帝滿文名中 *šūn* 最初避寫作 *šon*，已不是單純通過避音來達到避諱，而是通過改變字形，即截去 *šūn* 的長牙。至光、宣時期，二帝的滿文名徹底不再改寫為近似字音的詞彙，而是直接通過在左側添加外點進行避諱，讀音並不改變。由此可見，避諱字形已逐漸成為清代晚期滿文避諱的主流，避音反倒居於次位。

其次，咸豐以後，由於皇帝滿文御名中的詞彙，大多非滿文中常用詞語，主要用於個別漢字還音，加之只須避諱第二字，連寫時無須避諱等規定，導致滿文書寫

⁸⁸ 關於清朝何時開始正式確立廟諱避諱制度，學界目前尚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雍正帝即位後，清廷正式確立了較為嚴格的避諱制度。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雍正以前，清廷已對順治、康熙二帝之名如何避諱有所規定。參見張瑩，〈淺議清朝的避諱（國諱）制度〉，頁 115-119；春花，〈清代皇帝御名避諱制及滿漢文避諱字譜〉，頁 23；吳雪娟，〈清內府重抄本《翻譯三國志》暨《四大奇書第一種》初探〉，頁 122；黃一農，〈清代避諱研究〉，頁 19-58。

⁸⁹ 羅盛吉，〈清朝滿文避諱漫議〉，頁 19-20。

⁹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7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三日，頁 70。

⁹¹ 羅盛吉，〈清朝滿文避諱漫議〉，頁 21。

時需要避諱的情形大為減少。

康熙以後，清朝皇帝的命名便不再遵循滿、蒙語，而改以漢語為準。這就造成皇帝滿文名中，大部分詞彙以還音漢字為主，並非滿語中固有的詞彙。但由於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等皇帝滿文名中，多為常見字音，故涉及避諱的漢字為數較多，範圍也較為寬泛。以雍正帝滿文名 *in jen* 為例，*in* 涉及陰、音、寅、尹、蔭、印等多個字，為避雍正帝名諱，均改為 *yen*；*jen* 涉及珍、禎、貞、振、鎮等字，為避雍正帝名諱，均改作 *jeng*。由此可見，清代中前期，皇帝雖依漢文起名，但由於涉及諸多同音之字，滿文避諱的範圍較為廣泛。

但清代晚期，隨著皇帝滿文名還音漢字的數量大為減少，涉及避諱之處亦大為縮減。咸豐帝滿文名為 *i ju*，其中 *i* 不用避諱，*ju* 對音朱、珠、祝等字，避諱範圍尚廣。但咸豐以後，各代皇帝滿文御名較為少見，以致避諱情況大為減少。以同治帝為例，其名 *šün*，多對音淳、醇、順、舜等字，其他漢字如春、純等雖與「淳」字音相近，但滿文寫法不同，故無須避諱。光緒、宣統二帝之名，其字音則更不常用，僅對音特定的幾個漢字，以致避諱場景的範圍進一步縮小。此外，同治、光緒二帝還規定，出於對舜帝、天的敬畏，凡遇舜、天二字清文還音，均不避諱，這就導致原本無多的滿文避諱情況進一步減少。

最後，與清代中前期相比，清代晚期滿文避諱最為顯著的特點是，與同時期的漢文避諱相比，滿文避諱雖一直存在，但其推廣力度明顯減弱，實際執行情況也不再非常嚴格。

有諸多證據表明，咸豐以後，清朝國力雖有衰落，但皇帝漢文御名的避諱仍較為嚴格。以各級官員的日記而言，許多官員在記錄大行皇帝駕崩的消息時，都記載了新皇帝御名的避諱方式。例如，咸豐十一年七月，咸豐帝駕崩，翁心存（1791-1862）於當月二十日的日記中記載了同治帝漢文名的避諱諭旨：「閱邸報，上諭：尊兩宮皆為皇太后，又御名上一字母庸改避，下一字母庸缺筆，章奏內用『涓』字改避。」⁹² 祁寯藻（1793-1866）亦於當年十月初九日的日記中記載道：「奉旨：『御名上一字母庸恭避，下一字謹避，書作涓，以前書籍毋庸追改。』」⁹³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帝駕崩，翁曾翰（1837-1878）於當月初六日記載：「奉上諭：御名上一字，毋庸改避；下一字缺寫末筆，書作涓字，其奉旨以前所刻書籍，俱毋

⁹²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634。

⁹³ 祁寯藻著，任國維總主編，《祁寯藻集》第1冊（太原：三晉出版社，2009），《息園日記》，頁261。

庸議。」⁹⁴ 此外，《避諱錄》、《輶軒語》、《宦鄉要則》等書均對清朝皇帝漢文名的避諱有詳細記載。⁹⁵

反之，旗人官員所作日記、文章中，極少有對皇帝滿文名避諱情況的記載。清末大臣有泰 (1844-1910) 為蒙古正黃旗人，他曾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記載「〔前缺〕舊書下一字，敬缺一撇作儀字」，但其日記並未記錄滿文避諱信息。⁹⁶ 醇親王載灃 (1883-1951) 在日記中，記錄了宣統年號、定東陵等滿文寫法，但他依然只記載了宣統帝漢文名的避諱諭旨，並未記載滿文避諱。⁹⁷ 其他旗人日記中，也尚未發現記錄滿文避諱的實例。

此外，歷朝漢文《實錄》對皇帝滿文名避諱的記載，也反映出咸豐以後，清廷對漢文避諱的重視，超過滿文避諱。從《文宗實錄》至《宣統政紀》，皆對清帝漢文名的避諱規範有所記載。如《文宗實錄》卷一載：「朕敬遵成命，將御名上一字仍舊書寫，毋庸改避。下一字著缺寫末一筆，書作訖字，以示改避之意。其奉旨以前所刻書籍，俱無庸議。」⁹⁸ 又如《穆宗實錄》卷一載：「今朕敬遵成憲，將御名上一字仍舊書寫，毋庸改避。下一字母庸缺筆，凡臣工奏章內遇有此字，著用渇字改避。其奉旨以前所刻書籍，俱毋庸議。」⁹⁹

然而對照同一時期《實錄》對皇帝滿漢文御名避諱的記載，則可發現，兩者內容的詳略程度相去甚遠。《文宗實錄》中，曾記載咸豐帝滿文名避諱的第二次規定：「避寫朕名下一字，現俱書作 jo 字，但與 ju 字無所區別。嗣後如遇單字，著書作 jū，無庸書作 jo。」¹⁰⁰ 但此後的《實錄》中，除記錄光緒帝滿文名遇「天」字還音無須避諱外，再無任何關於滿文避諱的內容。

⁹⁴ 翁曾翰著，張方整理，《翁曾翰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 313。

⁹⁵ 黃本驥著，劉范弟點校，《避諱錄》（長沙：岳麓書社，2009），卷 1，頁 320-322；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 12 冊（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輶軒語》，〈輶軒語二·敬避字第五〉，頁 216-217；張鑒瀛輯，《宦鄉要則》，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 9 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景印清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卷 1，〈敬避字樣〉，頁 104。

⁹⁶ 俞冰、楊光輝編，《稿本有泰文集》第 10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頁 508。

⁹⁷ 愛新覺羅·載灃，《醇親王載灃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2014），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頁 301-302。

⁹⁸ 賈楨等纂修，《文宗顯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40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道光三十年正月庚戌，頁 73。

⁹⁹ 寶鋆等纂修，《穆宗毅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4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咸豐十一年七月甲辰，頁 76。

¹⁰⁰ 賈楨等纂修，《文宗顯皇帝實錄》，《清實錄》第 40 冊，卷 13，道光三十年七月甲午，頁 197。

更能反映滿文避諱受重視程度遠不如漢文避諱的情況，出現於光緒朝滿文《會典》的記載。在滿文《會典》中，記載了咸豐、同治、光緒三帝御名的避諱規定：

wendung iletu hūwangdi i enduringgei gebu i dergi emu hergen be halame jailarakū, fejergi emu hergen oci gingguleme wajima jijun be ararakū. dalbai jijun i adali hergen oci jailame ararakū. mudzung filingga hūwangdi i enduringgei gebu i dergi emu hergen be halame jailarakū, fejergi emu hergen oci ici ergi dalbai jijun be gingguleme jailame šuwen sere hergen arambi. dalbai jijun i adali hergen oci jailame ararakū. hūwangdi i wesihun gebu i dergi emu hergen be halame jailarakū, fejergi emu hergen oci ici ergi dalbai jijun be wajima jijun be gingguleme ararakū. dalbai jijun i adali hergen oci jailame ararakū.¹⁰¹

〔譯文〕文宗顯皇帝聖諱，上一字母庸改避，下一字敬缺末筆。其偏旁相同之字，毋庸避寫。穆宗毅皇帝聖諱，上一字母庸改避，下一字右旁敬避作 šuwen（言）字。其偏旁相同之字，毋庸避寫。皇帝御名上一字母庸改避，下一字右旁敬避缺寫末筆，其偏旁相同之字母庸避寫。

對比漢文《會典》，可以發現，滿文《會典》對咸豐、同治、光緒三帝御名的避諱記載，完全是漢文避諱方式的翻譯，並不能體現出滿文避諱的特點。由此可見，對朝廷而言，滿文避諱雖不可忽視，但漢文避諱顯然更加重要。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隨著清代皇帝漢文御名的避諱進入「二名不偏諱」時代，滿文避諱也產生了上述一系列新的變化和特點，這些特點既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清代的政治環境，也反映出彼時清朝長期試圖維持的多元化政治生態所受到的挑戰。

其一，咸豐以後，皇帝滿文御名的避諱，對避諱字形的重視逐漸超過了避音，這種仿效漢文避諱單純改變字形的方式，雖然減少了避諱的複雜性，但因其並不符合滿文文字本身的特性，難以融入日常的滿文書寫，故不但一度造成避諱書寫時的混亂，而且清朝甫一滅亡，便失去了影響力。相反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滿文避諱，多採用「另取音聲相似者」之方式，經過長期實踐，已成為滿文書寫體系的一部分，並沿用至清朝滅亡以後。

¹⁰¹ 昆岡等續修，滿文《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朝）》，卷 32，〈禮部·儀制清吏四六〉，編號 1676515135，頁 22a。

1912 年以後，隨著清朝退出歷史舞臺，滿文在全國亦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但因歷史和族群等因素，少數邊疆地區在 1912 年以後仍繼續以滿文書寫公文，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管轄的陳巴爾虎 (fe barhū)、新巴爾虎 (ice barhū) 地區便是典型代表。從陳巴爾虎、新巴爾虎存留的 1917 至 1932 年間的滿文檔案可以看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所規定的滿文避諱字樣，大多直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仍在使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所規定的滿文避諱字樣，雖部分仍在使用，但書寫混亂，早已不符合清廷原本的規定。例如，乾隆帝本名 *hung li*，避諱寫作 *hūng lii*，在民國時期的陳巴爾虎檔案中，*hung* 仍然寫作 *hūng*，*li* 亦寫作 *lii*，並未改回原本的寫法。¹⁰² 又如，嘉慶帝本名 *yung yan*，*yung* 避寫作 *yong*，在陳巴爾虎、新巴爾虎滿文檔案中，*yung* 依舊寫作 *yong*。¹⁰³ 相反地，對於光緒帝之名 *tiyan*，原本清廷規定遇還音「天」字時無須避諱，其他時候皆避寫作 *tiyañ*，但在陳巴爾虎的滿文檔案中，奉天寫作 *fung tiyañ*，姓氏「田」字反而被寫作 *tiyan*（詳見表二）。¹⁰⁴

除了官方檔案外，清朝滅亡後的私人滿文著述中對於避諱字的使用，也呈現同樣的現象。敦吉納 (donjina, c. 1845-?) 原為黑龍江齊齊哈爾達斡爾人，曾於同治初年隨軍出關作戰，並參加了收復新疆之戰。敦吉納在晚年，以滿文撰寫回憶錄，記載了自己一生的經歷及清末民初中國（尤其是新疆）的歷史。與巴爾虎官方類似，敦吉納在回憶錄中將李鴻章 (1823-1901) 之名以滿文避諱字拼寫作 *lii hūng jang*，但他按照漢語書寫「屯田」一詞時，卻僅寫作 *tun tiyan*，並未採用光緒時期規定的避諱字 *tiyañ*。¹⁰⁵ 由此可見，通過改變字形來進行避諱，雖然可以避免「去本音甚遠」的麻煩，¹⁰⁶ 卻大為減少了滿文避諱所具有的文化影響和生命力。

¹⁰² 《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編委會編，《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17），〈呼倫貝爾副都統貴福為令緝拿騙取呼倫縣洪順利鋪布匹綢緞並殺人之人犯田振青事致索倫、巴爾虎、厄魯特各總管各札文〉，1922 年 2 月 16 日，頁 1061-1074。

¹⁰³ 同前引，〈呼倫貝爾副都統貴福為督軍府採買軍馬事致索倫左右兩翼、新巴爾虎左右兩翼、陳巴爾虎、布里亞特旗札文〉，1928 年 5 月 13 日，頁 906-910。

¹⁰⁴ 新巴爾虎左旗政協、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呼倫貝爾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編，《新巴爾虎左旗滿文歷史檔案》第 4 卷（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21），〈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左廳為分攤防邊官兵餉銀及捐助奉天軍馬價銀兩事致索倫左翼、新巴爾虎左翼、陳巴爾虎及厄魯特總管咨文〉，1925 年 8 月 19 日，頁 2148-2151。

¹⁰⁵ 敦吉納，〈清朝同治初年至金順將軍進駐伊犁前後情況〉（“cing gurun i yooningga dasan i tuktan erin deribume jin jiyang jiyun i ili de dosiha juleri amala i baita hacin be muru šeme fisem buhengge”），收入佟玉泉、佟克力編，《錫伯族民間散存清代滿文古典文獻》（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頁 167。

¹⁰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7 冊，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三日，頁 70。

表二：陳巴爾虎、新巴爾虎滿文檔案中對清代滿文避諱字的書寫

時間	內容	避諱	資料來源
1922.02.16	emu coohai niyalma gebu be tiyan jen cing 一軍人名曰田振青	否	《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頁 1062
1922.02.16	hūng šun lli puseli 洪順利鋪	是	《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頁 1062
1922.02.16	ice giyai hūng tai cang 新街洪泰昌	是	《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頁 1063
1922.11.21	fung tiyañ i siyūn yuwei ši 奉天巡閱使	是	《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頁 791
1924.10.26	urunakū juwe sing ci i dolo hafan tomilame tuwašatabume fung tiyañ de benjibukini 務須 於兩星期內派官送至奉天	是	《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頁 874
1925.08.19	fung tiyañ i akta morin i hūda 奉天驕馬價格	是	《新巴爾虎左旗滿文歷史檔案》，頁 2150
1928.05.13	fu hafan joo yong šeo 副官趙永壽	是	《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頁 907
1932.03.05	fung tiyañ i goloi dasan yamun 奉天省政府	是	《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頁 119

其二，咸豐以後，清廷對滿文避諱的重視程度逐漸衰減，民間對滿文避諱也不再嚴格，但這並不能簡單視為清代晚期滿文政治地位大幅下降以及朝廷控制力迅速衰減的表現。

一方面，滿文避諱在光緒朝《會典》中雖無記載，旗人官員也幾乎沒有記錄滿文避諱的諭旨，但朝廷對年號、徽號、廟號、陵號等其他方面滿文名號的推廣仍不遺餘力。以滿、蒙文年號為例，官方檔案和滿文抄本、刻本書籍中的記載，遠較滿文避諱豐富。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溥儀繼位，軍機大臣等擬定宣統、憲昌、憲治、聖憲四個年號，最後硃筆圈出宣統年號。¹⁰⁷ 年號確定後，即通行全國各地並告知滿文寫法：「軍機大臣奉硃筆圈出建元年號用  (gehungge doro) 宣統二字」。¹⁰⁸ 不久朝廷又認為原先的滿文年號不妥，於是將其改為  (gehungge yoso)，蒙文

¹⁰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 34 冊，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頁 261。

¹⁰⁸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局合編，《清代新疆檔案選輯》第 34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鎮迪道飭轉禮部行知建元年號用宣統二字一事札吐魯番廳文〉，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五日，頁 71。

ᡤᡠᡳᡳ (kebtü doru) 改為 ᡤᡠᡳᡳ (kebtü yosun)。¹⁰⁹ 滿文年號也出現在各類滿文抄本和刻本書籍中。光緒時期的《官銜名目》(*hafan hergen i gebu*) 一書，開篇即有「國朝年號」一節，列出了從天命至光緒的滿漢文年號。¹¹⁰ 至於徽號、廟號、陵號等滿文名號，更是隨處可見於各類檔案和書籍。由此可見，直至清末，滿文在政治上仍有相當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清代晚期的滿文避諱雖然逐漸寬鬆，但漢文避諱仍較為嚴格，顯出避諱對社會影響之深以及朝廷權威猶存。以宣統帝名諱為例，溥儀雖僅在位三年，但避諱所影響的範圍仍然十分廣泛。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清廷頒佈上諭，規定宣統帝名諱的避諱方式為儀字缺寫末筆作儀。此後，官方與民間皆受此影響，出現大量缺筆字或直接改易為其他字。對官方而言，自上諭頒發後，大量公文、官書等均對儀字進行了避諱。以《起居注》為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光緒朝《起居注》所載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及之前的內容，凡涉及「儀」字之處，均正常書寫。但自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的記載開始，凡涉及「儀」字，均照上諭要求缺少最後一筆寫作儀。¹¹¹ 因此可以斷定，現存光緒朝《起居注》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以後的內容，最早的成書時間不早於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了宣統時期，《起居注》中所有涉及「儀」字的內容，均缺筆避諱。如宣統三年四月十四日，《內起居注》記載，「上詣儀鸞殿皇太后前請安」。¹¹²

總體而言，因宣統帝之名避諱的情形非常廣泛，對官方和民間均造成較大的影響，歸納起來，大致以下幾方面的避諱情況較為突出：

(一) 政府公文、檔案中涉及儀字，如不能改易其他文字，一律按上諭要求缺寫末筆。

¹⁰⁹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檔案史志局編，《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第 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為通飭改動宣統年號之滿蒙文稱謂事致阿拉善旗和碩親王多羅特色楞札文〉，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頁 624。

¹¹⁰ 哈豐阿，《官銜名目》（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五年（1889）聚珍堂刻本，編號 3305353902），頁 1a。

¹¹¹ 徐致祥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光緒朝》第 78 冊，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十六日，頁 39541。另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亦藏有光緒朝《起居注》，據該館統計，共計正本三十二冊，稿本七百五十四冊，內起居注一冊，但經查閱，該館所藏《起居注》所載內容自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開始，已經對「儀」字進行避諱，故其是否為稿本仍然存疑。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帝起居注》第 15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頁 286。

¹¹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宣統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宣統三年四月十四日，頁 604。

（二）各地政府建築名稱中帶有儀字，改換為其他字，如儀門改稱宜門。¹¹³

（三）凡帶有儀字的地名、人名等，均需要改避御名。例如，河南蘭儀縣與四川儀隴縣的縣名中均有儀字，蘭儀縣改名為蘭封縣，儀隴縣改為宜隴縣。¹¹⁴ 其他帶有儀字的地名、人名（主要是官員），也都用類似的方式進行避諱。

（四）新聞報紙中帶有儀字者，基本採取上諭中所規定諱缺末筆的方法。新聞報紙作為晚清以來出現的新事物，雖擁有比官方文書更大的自由，但仍深受避諱制度的影響。例如辦於北京的《淺說畫報》，是一種圖文結合的報紙，該畫報在1911年一則反映南京近況的消息中，寫道：「近聞南京儀風門，每上午十二鐘開門」。¹¹⁵ 其中「儀風門」三字中的儀字缺寫末筆（圖四）。值得注意的是，儀風門與官方衙署的儀門直接改名不同，可見避諱在不同層次、不同場合下有所區別。

（五）日常生活中其他一些帶有「儀」字的詞彙如「儀器」等，或更改名稱，或諱缺末筆。

概而言之，避諱不外乎兩種情況：一是將原來帶有儀字的詞語用其他漢字取代，徹底避開皇帝名諱；二是在保留儀字的情況下，按照上諭要求缺寫最後一筆。此時雖已是清朝統治的末期，但仍可看到，在短短三年之內，避諱範圍之廣、影響之大，亦可證明，滿文避諱的寬鬆，並不能反映朝廷權威和控制力的快速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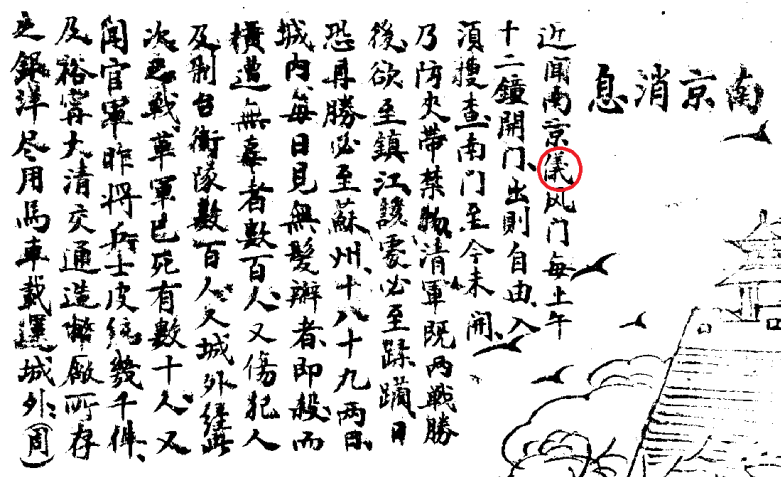
事實上，清廷對滿文避諱重視程度的減弱，很可能與十九世紀以來滿、漢關係的變化以及公文體系中滿、漢文的使用有密切關係。

一方面，經過十七、十八世紀特別是乾隆時期的發展，在清朝官僚體系中，滿、漢官員之間無論在業務往來還是私人關係層面，均變得愈來愈「各司其職」。換言之，十九世紀以降，滿漢官員之間公、私層面的往來逐漸減少，導致漢人官員對滿文公文以及旗人官員辦公內容的瞭解急劇減少，進而造成作為政治規範和政治常識的滿文避諱的生存場景大為縮減。以軍機處的軍機章京為例，十九世紀以前，滿、漢章京在業務層面經常進行合作，共同處理奏摺和上諭的記載和轉發；十九世

¹¹³ 徐凌霄、徐一士著，徐澤昱編輯，劉悅斌、韓策校訂，《凌霄一士隨筆》（北京：中華書局，2018），〈談避諱〉，頁1320。

¹¹⁴ 《宮中檔案硃批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奏請將蘭儀縣更改為蘭封縣儀封鄉學改為蘭封鄉學事〉，宣統元年二月十五日，檔號04-01-01-1095-032；〈四川總督趙爾巽奏為儀隴縣改為宜隴縣請敕部改鑄印信頒發事〉，宣統元年七月十二日，檔號04-01-30-0004-033。

¹¹⁵ 周小山，〈南京消息〉，《淺說畫報》，1065（北京：1911），頁5。



圖四：《淺說畫報》1911年第1065期對「儀」字的缺筆避諱

紀以後，漢章京不但經常誤認為滿章京「無所事事」，且與滿章京「絕少往來」。¹¹⁶ 清朝官僚體系內部的這種變化，在相當程度上導致滿文避諱，由整個王朝的政治規範和文化，逐漸內縮為旗人社會內部的政治常識。¹¹⁷

另一方面，十九世紀以來公文體系中滿、漢文的使用情況的變化，進一步壓縮了滿文避諱的使用場景。清朝入關之初，因滿洲官員多不諳於漢語，故長期設置啟心郎 (mujilen bahabukū) 來溝通滿、漢（旗、民）官員。¹¹⁸ 與此同時，滿文在公

¹¹⁶ 呂允甫，〈樞曹追憶〉，《中和月刊》，1.10（北京：1940），頁43。關於清代軍機處滿、漢章京的關係，參見張凌霄，〈軍機處的滿伴與清代中樞機構之變遷〉，《清史研究》，4（北京：2021），頁68-81。

¹¹⁷ 事實上，在當時的清朝官僚體系內部，除了滿、漢官員之間的關係發生巨大變化外，旗員（特別是滿洲官員）與其他族群官員（精英人士）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動。以新疆伯克為例，清朝統治者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葉通過與伯克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合作，鞏固和發展了清朝在新疆的統治。但是，隨著十九世紀下半葉新疆發生一系列戰爭並最終設立行省，伯克雖在某種程度上仍與清朝統治者進行合作，但其在清朝官僚體系中的地位已然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參見陳殷宜，《清朝回疆伯克制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9）；張凌霄，《西陲永固：國家視閥下清代後期「新疆」的重塑（1821-1911）》（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25）；Kevin Kind, "Muslim Knowledge, Local Hist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Qing Nation-State," *Late Imperial China*, 42.2 (2021), pp. 91-135; Kwangmin Kim, *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Redwoo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¹¹⁸ 邱永君，〈啟心郎考〉，《歷史研究》，1（北京：2006），頁174-177；沈一民，〈啟心郎與清初政治〉，《史學月刊》，6（開封：2006），頁31-36。學界常以滿、漢作為劃分清代社會的標準，但就滿文避諱而言，不但滿、蒙旗人姓名需要避諱皇帝的滿文御名，八旗漢軍之漢文名（寫作滿文時），亦須避諱滿文御名，而皇帝對旗人和民人的避諱要求也不盡相同。因此筆者以旗、民兩種身分區隔不同群體。

文體系中也佔據優勢地位。¹¹⁹ 但是，康熙、雍正以後，隨著旗人官員對漢語、漢文逐漸熟練掌握，漢文在清代公文體系中的比重逐漸增加，越來越多的事務開始以漢文書寫。例如，雍正元年（1723）九月，因西安將軍普照（pujoo, 1691-1724）不會清文楷字，雍正帝特准其密奏之摺均用漢文。¹²⁰ 乾隆十一年二月，乾隆帝又指示駐紮西寧辦理青海番子事務之副都統莽古賚（manggūlai, 1710-1785）等官員，嗣後凡奏報地方民情及綠營事務，可用漢字，若蒙古、唐古忒等事務，須用滿文奏報。¹²¹ 十九世紀以後，除了八旗軍政、旗人謝恩等例行事務外，其他政務已經均用漢文奏報，滿文雖然仍在公文體系中使用，但已被限定於特定的場景和範圍之內。¹²² 在這種情況下，滿文避諱的應用場景大幅縮減，自然遠不及漢文避諱受到重視。¹²³ 這也從某種程度上標誌著，十八世紀清朝統治者所精心維持的多元化統治，已然面臨困境，過去較為平衡的旗、民政治生態，亦難以繼續維持下去。

六、結語

近年來，隨著中外學界對清朝統治中「滿洲特色」的關注，滿文一度成為學界焦點，滿文避諱也逐漸開始引起討論。已經有許多學者反駁了過去關於滿文在清代中期以後迅速衰落的印象，但囿於傳統認識，特別是近代以來長期形成的「滿語衰落論」，學界對滿文避諱，普遍關注嘉慶以前的情況，並利用各類史料討論避諱實

¹¹⁹ Bartlett Beatrice, "Books of Rev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rchival Record Books for Research on Ch'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6.2 (1985), pp. 25-36.

¹²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上冊（合肥：黃山書社，1998），〈署理西安將軍印務普照奏請不會寫清文楷字密摺准用漢字摺〉，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頁 355-356。

¹²¹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軍機大臣訥親等為傳諭傳清等用漢字具摺奏事殊屬非是著飭行嗣後奏事具繕寫清字事寄信駐藏大臣傳清〉，乾隆十一年二月初一日，檔號 03-18-009-000006-0001。

¹²² 同前引，〈為廣州將軍慶保等之軍政考核奏摺及請安摺皆用漢字殊屬非是著各省將軍副都統嗣後奏報滿洲營務俱書清字事〉，道光七年十月初七日，檔號 03-18-009-000081-000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 22 冊，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頁 286-287。關於清代公文體系中滿、漢文的應用是一個較為複雜的問題，筆者當另撰文詳細討論。

¹²³ 需要注意的是，在清代晚期，並非只有滿文在清朝公文體系中的生存空間被極大地壓縮，蒙文、藏文、察合台文等其他語言文字在公文體系中的生存空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壓縮。參見湛曉白，〈清末國家語文統一與滿漢族群關係變化〉，《歷史研究》，5（北京：2021），頁 77-100；黃興濤、黃娟，〈清末「國語」的概念轉換與國家通用語的最初構建〉，《近代史研究》，6（北京：2022），頁 34-52；Eric T. Schluessel, "Language and the State in Late Qing Xinjiang," in Birgit N. Schlyter (ed.), *Historiograph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urkic Populations* (Stockholm: Swedish Research Institute in Istanbul, 2014), pp. 145-167.

例。至於清代晚期的滿文避諱制度，則主要賴於少數幾種文獻，這就導致現有研究既不能反映滿文避諱的變化，也無法深入探討日常行文時滿文避諱的複雜情況。

事實上，直至清末，滿文避諱仍然存在，並在官方層面得到較為嚴格的執行。清廷通過改變拼寫、添加外點等方式，對君主的滿文御名加以避諱，從而體現森嚴的等級差異。不過，與官方較為簡便、單一的滿文避諱規範相比，無論是官府還是民間，其避諱的具體情況都更加複雜、多樣化，顯示出制度規範與日常統治之間的複雜的互動關係。同時，與清代中前期相比，咸豐以降的滿文避諱，逐漸呈現一種「內向性」趨勢：滿文避諱不再出現於一般的漢文典籍中，亦不被民人所熟知，成為旗人內部小範圍的一種知識和政治規範。這也彰顯出，隨著清朝內、外政治情勢的變化，過去較為平衡的旗、民（滿、漢）政治生態逐漸被打破，清廷所維持的多元化統治亦受到威脅和挑戰。

除此以外，清朝皇帝御名避諱制度，不僅涉及漢文與滿文兩種語言文字及其使用群體，還影響了蒙古、西藏與新疆等其他邊疆地區。譬如，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駕崩後，咸豐帝即位，隨後朝廷便開始將如何避諱新君名諱之規定傳至全國各地。朝廷除了規定咸豐帝的滿、漢御名應如何避諱外，還在蒙古地區頒佈規定，咸豐帝名諱第二字蒙文應寫作 **ᠠ** (ju)。¹²⁴ 這反映出，清代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間所存在的廣泛而深入的接觸和交流。不過遺憾的是，目前學界對清代避諱制度的關注，仍集中於漢文和滿文，並未關注蒙文、藏文和察合台文等語言文字中所蘊藏的清代避諱制度。如果未來學界對清代避諱制度的研究，可以在現有研究基礎之上超越漢文和滿文的藩籬，將對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認識清朝多元的政治文化以及族群治理不無裨益。

¹²⁴ 烏雲畢力格、遲煊主編，《清代五當召蒙古文歷史檔案匯編》第 10 冊（赤峰：內蒙古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綏遠城將軍衙門為轉行敬避皇帝名諱相同字事筭廣覺寺達喇嘛德木齊等文〉，頁 3870-3874。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內務府來文》*Neiwufu laiwen*，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 cang。
- 《內閣大庫檔案》*Neige daku dang'an*，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Fu Sinian tushuguan cang。
- 《內閣禮科題本》*Neige like tiben*，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 cang。
- 〈伍廷芳國書〉“Wu Tingfang guoshu”，美國國家檔案館藏 Meiguo guojia dang'anguan cang。
- 《軍機處滿文上諭檔》*Junjichu Manwen shangyudang*，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 cang。
-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Junjichu Manwen lufu zouzhe*，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 cang。
- 《軍機處檔摺件》*Junjichu dang zhejian*，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
- 《宮中檔奏摺》*Gongzhongdang zouzhe*，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
- 《宮中檔案硃批奏摺》*Gongzhong dang'an zhupi zouzhe*，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 cang。
- 《宮中檔滿文奏摺》*Gongzhongdang Manwen zouzhe*，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
- 《新整宗人府》*Xinzheng Zongrenfu*，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 cang。
- 〈蒲安臣國書〉“Pu Anchen guoshu”，美國國家檔案館藏 Meiguo guojia dang'anguan cang。
- 《舊整宗人府》*Jiuzheng Zongrenfu*，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 cang。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 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Guangxu Xuantong liangchao shangyudang*，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1996。

- _____,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Xianfeng Tongzhi liangchao shangyudang*,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98。
- _____, 《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 *Yongzhengchao Manwen zhupi zouzhe quanyi* 上冊, 合肥 Hefei: 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 1998。
- _____,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 *Jiaqing Daoguang liangchao shangyudang*,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0。
- _____, 《乾隆帝起居注》 *Qianlongdi qijuzhu* 第 7 冊,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2。
- _____, 《光緒帝起居注》 *Guangxudi qijuzhu* 第 15 冊,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7。
- _____, 《宣統帝起居注》 *Xuantongdi qijuzhu*,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7。
- _____, 《中琉歷史關係檔案·乾隆朝》 *Zhong Liu lishi guanxi dang'an, Qianlongchao* 第 5 冊, 北京 Beijing: 中國檔案出版社 Zhongguo dang'an chubanshe, 2008。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Zhongguo di yi lishi dang'anguan*、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zhongxin*、吉林省延吉檔案館 *Jilinsheng Yanji dang'anguan* 編, 《琿春副都統衙門檔案》 *Hunchun fu dutong yamen dang'an*,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96。
-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zhongxin*、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局 *Xinjiang Weiwu'er zizhiq dang'anju* 合編, 《清代新疆檔案選輯》 *Qingdai Xinjiang dang'an xuanji* 第 34 冊, 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2。
-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檔案史志局 *Nei Menggu zizhiq Alashan zuoqi dang'an shizhiju* 編, 《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 *Qingdai Alashan Heshuoteqi Mengguwen dang'an xuanbian* 第 5 冊, 北京 Beijing: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 2015。
- _____, 《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滿文檔案選編》 *Qingdai Alashan Heshuoteqi Manwen dang'an xuanbian* 第 10 冊, 北京 Beijing: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 2016。
- 巴 泰 Batai 等纂修, 《大清世祖章皇帝滿文實錄》 *Daqing Shizu Zhang huangdi Manwen shilu*,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
- 世 續 Shixu 等修, 《德宗景皇帝實錄》 *Dezong Jing huangdi shilu*, 《清實錄》 *Qing shilu* 第 55 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7。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 Beijing tushuguan jinshizu 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Beijing tushuguan cang Zhongguo lidai shike taben huibian* 第90冊，鄭州 Zhengzhou：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1989。
- 扎克丹 Zhakedan，《擇譯聊齋志異》*Zeyi Liaozhai zhiyi*，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二酉齋刻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sanshisan nian（1907）Eryouzhai keben，編號 3305268670。
- 佚名 Anonymous，《繙譯存稿》*Fanyi cunghao*，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清抄本 Hafo daxue Yanjing tushuguan cang Qingchaoben。
- 吳忠良 Wu Zhongliang、趙洪祥 Zhao Hongxiang 主編，《清代伯都訥滿漢文檔案選輯》*Qingdai Bodune Man Han wen dang'an xuanji* 上冊，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18。
- 志寬 Zhikuan、培寬 Peikuan，《對音輯字》*Duiyin jizi*，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六年（1890）繙譯總學刻本 Zhongguo kexueyuan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shiliu nian（1890）fanyi zongxue keben。
- ，《清文總彙》*Qingwen zonghui*，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荊州駐防繙譯總學刻本 Zhongyang minzu daxue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ershisan nian（1897）Jingzhou zhufang fanyi zongxue keben。
- 周小山 Zhou Xiaoshan，〈南京消息〉“Nanjing xiaoxi”，《淺說畫報》*Qianshuo huabao*，1065，北京 Beijing：1911，頁 5。
- 孟保 Meng Bao 譯，《繙譯大學衍義》*Fanyi Daxue yanyi*，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咸豐六年（1856）武英殿刻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Xianfeng liu nian（1856）Wuyingdian keben，編號 3304247254。
- ，《繙譯古文觀止》*Fanyi Guwen guan zhi*，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抄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chaoben，編號 3304247270。
- 昆岡 Kungang 等續修，滿文《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朝）》*Manwen Qinding Daqing huidian (Guangxuchao)*，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內府寫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neifu xieben。
- ，滿文《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Manwen Qinding Daqing huidian shili (Guangxuchao)*，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內府寫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neifu xieben。
- ，《清會典事例（光緒朝）》*Qing huidian shili (Guangxuchao)* 第1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1。
- 祁寯藻 Qi Junzao 著，任國維 Ren Guowei 總主編，《祁寯藻集》*Qi Junzao ji* 第1冊，太原 Taiyuan：三晉出版社 Sanjin chubanshe，2009。

- 故宮博物院 Gugong bowuyuan 編，《故宮珍本叢刊·滿蒙漢合璧教科書》*Gugong zhenben congkan, Man Meng Han hebi jiaokeshu* 第5冊，海口 Haikou：海南出版社 Hainan chubanshe，2000。
- ，〈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善本特藏編·滿文古籍〉*Gugong bowuyuan cangpin daxi shanben tecang bian, Manwen guji*，北京 Beijing：故宮出版社 Gugong chubanshe，2014。
- 哈豐阿 Hafeng'a，〈官銜名目〉*Guanxian mingmu*，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五年 (1889) 聚珍堂刻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shiwanian (1889) Juzhentang keben，編號 3305353902。
- 奎潤 Kuirun 等纂修，李兵 Li Bing、袁建輝 Yuan Jianhui 點校，〈欽定科場條例〉*Qinding Kechang tiaoli* 下冊，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shushe，2020。
- 翁心存 Weng Xincun 著，張劍 Zhang Jian 整理，〈翁心存日記〉*Weng Xincun riji* 第4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1。
- 翁曾翰 Weng Zenghan 著，張方 Zhang Fang 整理，〈翁曾翰日記〉*Weng Zenghan riji*，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2014。
- 奕賡 Yigeng 著，雷大受 Lei Dashou 校點，〈佳夢軒叢著〉*Jiamengxuan congzu*，北京 Beijing：北京古籍出版社 Beijing guji chubanshe，1994。
- 俞冰 Yu Bing、楊光輝 Yang Guanghui 編，〈稿本有泰文集〉*Gaoben Youtai wenji* 第10冊，北京 Beijing：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2005。
- 徐致祥 Xu Zhixiang 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光緒朝〉*Qingdai qijuzhu ce, Guangxuchao*，臺北 Taipei：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 Lianhebao wenhua jijinhui guoxue wenxianguan，1987。
- 徐凌霄 Xu Lingxiao、徐一士 Xu Yishi，〈凌霄·一士隨筆〉*Lingxiao, Yishi suibi*，〈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Jindai Zhongguo shiliao congkan xubian* 第64輯，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1979。
- 徐凌霄 Xu Lingxiao、徐一士 Xu Yishi 著，徐澤昱 Xu Zeyu 編輯，劉悅斌 Liu Yuebin、韓策 Han Ce 校訂，〈凌霄一士隨筆〉*Lingxiao Yishi suib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8。
- 徐隆泰 Xu Longtai，〈清文字法舉一歌〉*Qingwen zifa ju yi ge*，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一年 (1885) 文寶堂刻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shiyi nian (1885) Wenbaotang keben，編號 3305232099。

- 烏雲畢力格 Uyunbilig Borjigidai、遲煊 Chi Xuan 主編，《清代五當召蒙古文歷史檔案匯編》*Qingdai Wudangzhao Mengguwen lishi dang'an huibian* 第10冊，赤峰 Chifeng：內蒙古科學技術出版社 Nei Menggu kexue jishu chubanshe，2018。
- 張鑒瀛 Zhang Jianying 輯，《宦鄉要則》*Huanxiang yaoze*，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 Guanzhenshu jicheng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官箴書集成》*Guanzhenshu jicheng* 第9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1997，景印清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 Yingyin Qing Guangxu shiliu nian（1890）kanben。
- 《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編委會 Chen Ba'erhu buluo Manwen lishi dang'an bianweihui 編，《陳巴爾虎部落滿文歷史檔案》*Chen Ba'erhu buluo Manwen lishi dang'an*，呼和浩特 Hohhot：遠方出版社 Yuanfang chubanshe，2017。
- 傅 恒 Fuheng 等纂，《欽定清漢對音字式》*Qinding Qing Han duiyin zishi*，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道光十六年（1836）武英殿重刊本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 Qing Daoguang shiliu nian（1836）Wuyingdian chongkanben，編號故殿 015904。
- 敦吉納 Dunjina，〈清朝同治初年至金順將軍進駐伊犁前後情況〉“Qingchao Tongzhi chunian zhi Jinshun jiangjun jinzhu Yili qianhou qingkuang”，收入佟玉泉 Tong Yuquan、佟克力 Tong Keli 編，《錫伯族民間散存清代滿文古典文獻》*Xibo zu minjian sancun Qingdai Manwen gudian wenxian*，烏魯木齊 Urumqi：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2008，頁 97-167。
- 黃本驥 Huang Benji 著，劉范弟 Liu Fandi 點校，《避諱錄》*Bihui lu*，長沙 Changsha：岳麓書社 Yuelu shushe，2009。
- 愛新覺羅·載灃 Aixin Jueluo Zaifeng，《醇親王載灃日記》*Chun qinwang Zaifeng riji*，北京 Beijing：群眾出版社 Qunzhong chubanshe，2014。
- 新巴爾虎左旗政協 Xin Ba'erhu zuoqi zhengxie、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 Nei Menggu zizhiqu dang'anguan、呼倫貝爾市民族事務委員會 Hulunbei'ershi minzu shiwu weiyuanhui 編，《新巴爾虎左旗滿文歷史檔案》*Xin Ba'erhu zuoqi Manwen lishi dang'an* 第4卷，呼和浩特 Hohhot：遠方出版社 Yuanfang chubanshe，2021。
- 萬 福 Wanfu 輯著，鳳山 Fengshan 修訂，《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Chongke Qingwen xuzi zhinanbian*，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聚珍堂刻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Guangxu ershi nian（1894）Juzhentang keben，編號 3371345785。
- 賈 楨 Jiazhen 等纂修，《文宗顯皇帝實錄》*Wenzong Xian huangdi shilu*，《清實錄》*Qing shilu* 第40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 趙煥林 Zhao Huanlin 主編，遼寧省檔案館 Liaoningsheng dang'anguan 編，《黑圖檔·嘉慶朝（下）》*Heitu dang, Jiaqingchao (xia)* 第32冊，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Xianzhuang shuju，2016。
- 趙德馨 Zhao Dexin 主編，《張之洞全集》*Zhang Zhidong quanji* 第12冊，武漢 Wuhan：武漢出版社 Wuhan chubanshe，2008。
- 德保 Debao 譯，《繙譯朱文公家訓》*Fanyi Zhu Wengong jiaxun*，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年（1765）鈔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Qianlong sanshi nian (1765) chaoben。
- ，〈繙譯朱子家訓〉*Fanyi Zhuzi jiaxun*，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宣統二年（1910）荊州駐防廣化善堂刻本 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Xuantong er nian (1910) Jingzhou zhufang guang huashantang keben。
- 慶格 Qingge、興德 Xingde，《讀史論畧》*Dushi lunlue*，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槐堂刻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Daoguang ershijiu nian (1849) Sanhuaitang keben，編號 3305398809。
- 慶桂 Qinggui 等纂修，《大清高宗純皇帝滿文實錄》*Daqing Gaozong Chun huangdi Manwen shilu*，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Guoli gugong bowuyuan cang。
- 寶鋈 Baoyun 等纂修，滿文《大清穆宗毅皇帝聖訓》*Manwen Daqing Muzong Yi huangdi shengxun*，德國柏林國立圖書館藏清武英殿刻本 Deguo Bolin guoli tushuguan cang Qing Wuyingdian keben。
- ，〈穆宗毅皇帝實錄〉*Muzong Yi huangdi shilu*，《清實錄》*Qing shilu* 第45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二、近人論著

- 卞仁海 Bian Renhai，〈出土先秦兩漢文獻中的避諱材料述論——兼論避諱的起源問題〉“Chutu xian Qin liang Han wenxian zhong de bihui cailiao shulun: jian lun bihui de qi yuan wen ti”，《古代文明》*Gudai wenming*，12.2，長春 Changchun：2018，頁 54-60。
- 卞仁海 Bian Renhai、王彥坤 Wang Yankun，〈也談「二名不偏諱」〉“Ye tan ‘erming bu pianhui’”，《勵耘語言學刊》*Liyun yuyan xuekan*，2，北京 Beijing：2017，頁 58-62。
- 王寧 Wang Ning，〈發現制度的「彈性」：作為過程的宋代避諱制度史之書寫與實踐〉“Faxian zhidu de ‘tanxing’: zuowei guocheng de Songdai bihui zhidushi zhi shuxie yu shijian”，《湖北社會科學》*Hubei shehui kexue*，7，武漢 Wuhan：2025，頁 73-85。

- 王新華 Wang Xinhua, 《避諱研究》*Bihui yanjiu*,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shushe, 2007。
- 甘德星 Kam Tak Sing, 〈滿文羅馬字拼寫法芻議〉“Manwen Luomazi pinxiefa chuyi”, 收入閻崇年 Yan Chongnian 主編, 《滿學研究》*Manxue yanjiu* 第 6 輯, 北京 Beijing: 民族出版社 Minzu chubanshe, 2000, 頁 50-68。
- 安雙成 An Shuangcheng, 〈滿語虛字 be、de、i、ci、deri 的用法〉“Manyu xuzi be, de, i, ci, deri de yongfa”, 《滿語研究》*Manyu yanjiu*, 2, 哈爾濱 Harbin: 1991, 頁 39-43。
- 安雙成 An Shuangcheng 主編, 《滿漢大辭典》*Man Han da cidian*, 瀋陽 Shenyang: 遼寧民族出版社 Liaoning minzu chubanshe, 1993。
- 吳雪娟 Wu Xuejuan, 〈清內府重抄本《翻譯三國志》暨《四大奇書第一種》初探〉“Qing neifu chongchaoben *Fanyi Sanguozhi* ji *Sida qishu di yi zhong chutan*”, 《黑龍江民族叢刊》*Heilongjiang minzu congkan*, 6, 哈爾濱 Harbin: 2024, 頁 117-122。
- 呂允甫 Lu Yunfu, 〈樞曹追憶〉“Shucaozhuyi”, 《中和月刊》*Zhonghe yuekan*, 1.10, 北京 Beijing: 1940, 頁 37-51。
- 李易航 Li Yihang, 〈清代滿文避諱制度淺談〉“Qingdai Manwen bihui zhidu qiantan”, 《黑河學刊》*Heihe xuekan*, 2, 黑河 Heihe: 2019, 頁 94-95。
- 李慧敏 Lee Hui-ming, 《滿文譯本《四書》探賾(上)》*Manwen yiben “Sishu” tanji (shang)*, 新北 New Taipei: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Hua Mulan wenhua chubanshe, 2020。
- 沈一民 Shen Yimin, 〈啟心郎與清初政治〉“Qixinlang yu Qingchu zhengzhi”, 《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 6, 開封 Kaifeng: 2006, 頁 31-36。
- 季永海 Ji Yonghai, 〈從接觸到融合(上)——論滿語文的衰落〉“Cong jiechu dao ronghe (shang): lun Manyuwen de shuailuo”, 《滿語研究》*Manyu yanjiu*, 1, 哈爾濱 Harbin: 2004, 頁 24-34。
- , 〈從接觸到融合——論滿語文的衰落(下)〉“Cong jiechu dao ronghe: lun Manyuwen de shuailuo (xia)”, 《滿語研究》*Manyu yanjiu*, 1, 哈爾濱 Harbin: 2005, 頁 49-55。
- , 《滿語語法(修訂版)》*Manyu yufa (xiudingban)*, 北京 Beijing: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2011。
- 武秀成 Wu Xiucheng, 〈段玉裁「二名不偏諱說」辨正〉“Duan Yucai ‘erming bu pianhui shuo’ bianzheng”, 《文獻》*Wenxian*, 2, 北京 Beijing: 2014, 頁 175-186。

- 邱永君 Di Yongjun, 〈啟心郎考〉“Qixinlang kao”, 《歷史研究》*Lishi yanjiu*, 1, 北京 Beijing: 2006, 頁 174-177。
- 春花 Chunhua, 〈清代皇帝御名避諱制及滿漢文避諱字譜〉“Qingdai huangdi yuming bihuizhi ji Man Han wen bihui zipu”, 《滿語研究》*Manyu yanjiu*, 2, 哈爾濱 Harbin: 2022, 頁 23-34。
- 范志新 Fan Zhixin, 《避諱學》*Bihuixue*,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 2006。
- 洪曄 Hong Ye, 〈故宮博物院藏滿文本《生綃剪》述考〉“Gugong bowuyuan cang Manwen ben *Shengxiaojian* shukao”, 《故宮博物院院刊》*Gugong bowuyuan yuankan*, 8, 北京 Beijing: 2021, 頁 73-81。
- 胡增益 Hu Zengyi 主編, 《新滿漢大詞典》*Xin Man Han da cidian*, 烏魯木齊 Urumqi: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94。
- 姜維東 Jiang Weidong、鄭麗娜 Zheng Lina, 〈遼代避諱問題研究〉“Liaodai bihui wenti yanjiu”, 《史學集刊》*Shixue jikan*, 6, 長春 Changchun: 2018, 頁 56-65。
- 張瑩 Zhang Ying, 〈淺議清朝的避諱（國諱）制度〉“Qianyi Qingchao de bihui (guohui) zhidu”, 收入武斌 Wu Bin 主編, 《多維視野下的清宮史研究》*Duowei shiye xia de Qinggong shi yanjiu*, 北京 Beijing: 現代出版社 Xiandai chubanshe, 2013, 頁 110-132。
- 張凌霄 Zhang Lingxiao, 《斷裂的「國語」：清帝國晚期的語言政治研究（1821-1911）》*Duanlie de 'Guoyu': Qing diguo wanqi de yuyan zhengzhi yanjiu (1821-1911)*, 濟南 Jinan: 山東大學碩士論文 Shandong daxue shuoshi lunwen, 2019。
- , 〈軍機處的滿伴與清代中樞機構之變遷〉“Junjichu de Manban yu Qingdai zhongshu jigou zhi bianqian”, 《清史研究》*Qingshi yanjiu*, 4, 北京 Beijing: 2021, 頁 68-81。
- , 《西陲永固：國家視閥下清代後期「新疆」的重塑（1821-1911）》*Xichui yonggu: guojia shiyu xia Qingdai houqi 'Xinjiang' de chongsu (1821-1911)*, 濟南 Jinan: 山東大學博士論文 Shandong daxue boshi lunwen, 2025。
- 陳力 Chen Li, 〈清朝旗人滿語能力衰退研究〉“Qingchao qiren Manyu nengli shuaitui yanjiu”,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Zhongyang minz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8.4, 北京 Beijing: 2011, 頁 114-121。
- 陳垣 Chen Yuan, 《史諱舉例》*Shihui juli*, 上海 Shanghai: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1997。

- 陳殷宜 Chen Yin-yi, 《清朝回疆伯克制度研究》*Qingchao Huijiang boke zhidu yanjiu*,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 2019。
- 陳彬彬 Chen Binbin, 〈秦莊襄王避諱及相關問題研究——以《呂氏春秋》和秦簡牘為中心〉“Qin Zhuangxiangwang bihui ji xiangguan wenti yanjiu: yi Lüshi Chunqiu he Qin jiandu wei zhongxin”, 《文獻》*Wenxian*, 1, 北京 Beijing: 2025, 頁 79-97。
- 湛曉白 Zhan Xiaobai, 〈清末國家語文統一與滿漢族群關係變化〉“Qingmo guojia yuwen tongyi yu Man Han zuqun guanxi bianhua”, 《歷史研究》*Lishi yanjiu*, 5, 北京 Beijing: 2021, 頁 77-100。
- 馮先思 Feng Xiansi, 〈金代避諱補考〉“Jindai bihui bukao”, 《歷史文獻研究》*Lishi wenxian yanjiu*, 2, 揚州 Yangzhou: 2020, 頁 220-225。
- 馮志弘 Fung Chi-wang, 〈李賀父諱問題之禮法及流俗考——以韓愈〈諱辯〉及唐代嫌名律為中心〉“Li He fuhui wenti zhi lifa ji liusu kao: yi Han Yu ‘Huibian’ ji Tangdai xianminglü wei zhongxin”, 《成大中文學報》*Chengda Zhongwen xuebao*, 69, 臺南 Tainan: 2020, 頁 37-76。
- 黃一農 Huang Yi-long, 〈從 e 考據看避諱學的新機遇：以己卯本《石頭記》為例〉“Cong e kaoju kan bihuixue de xin jiyu: yi Jimaoben *Shitouji* wei li”, 《文史》*Wenshi*, 2, 北京 Beijing: 2019, 頁 205-222。
- , 〈大數據時代避諱學的新機遇：以清初為例〉“Dashuju shidai bihuixue de xin jiyu: yi Qingchu wei li”, 《數字人文》*Shuzi renwen*, 4, 北京 Beijing: 2022, 頁 1-35。
- , 《清代避諱研究：e 考據的學術實踐》*Qingdai bihui yanjiu: e kaoju de xueshu shijian*, 新竹 Hsinchu: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Guoli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2024。
- 黃一農 Huang Yi-long、吳國聖 Wu Kuo-sheng, 〈清代對「胡虜夷狄」的文字避忌：以《宗忠簡集》、《楊忠愍集》、《平叛記》為例〉“Qingdai dui ‘hulu yidi’ de wenzi biji: yi Zong Zhongjian ji, Yang Zhongmin ji, Pingpan ji wei li”, 《清華學報》*Qinghua xuebao*, 新 54.1, 新竹 Hsinchu: 2024, 頁 7-59。doi: 10.6503/THJCS.202403_54(1).0001
- 黃緯中 Huang Wei-chung, 〈略論遼金的避諱〉“Lue lun Liao Jin de bihui”, 《史學彙刊》*Shixue huikan*, 26, 臺北 Taipei: 2010, 頁 23-60。doi: 10.29991/JHS.201012.0002
- 黃興濤 Huang Xingtao、黃娟 Huang Juan, 〈清末「國語」的概念轉換與國家通用語的最初構建〉“Qingmo ‘guoyu’ de gainian zhuanhuan yu guojia tongyongyu de

- zuichu goujian”，《近代史研究》*Jindaishi yanjiu*，6，北京 Beijing：2022，頁 34-52。
- 趙增越 Zhao Zengyue，〈清代皇帝的起名與避諱〉“Qingdai huangdi de qiming yu bihui”，《中國檔案》*Zhongguo dang'an*，5，北京 Beijing：2015，頁 74-75。
- 潘銘基 Poon Ming Kay，〈《史記》與先秦兩漢互見典籍避諱研究〉“*Shiji yu xian Qin liang Han hujian dianji bihui yanjiu*”，《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49，香港 Hong Kong：2009，頁 35-64。doi: 10.29708/JCS.CUHK.200901_(49).0002
- 盧正恒 Lu Cheng-heng，〈清代滿文避諱：兼論乾隆朝避諱運用實例〉“Qingdai Manwen bihui: jian lun Qianlongchao bihui yunyong shili”，《清華學報》*Qinghua xuebao*，新 48.3，新竹 Hsinchu：2018，頁 489-524。doi: 10.6503/THJCS.201809_48(3).0002
- 聶激萌 Nie Weimeng，〈六朝避諱考辨〉“Liuchao bihui kaobian”，《古典文獻研究》*Gudian wenxian yanjiu*，1，南京 Nanjing：2018，頁 222-234。
- 羅盛吉 Luo Shengji，〈清朝滿文避諱漫議〉“Qingchao Manwen bihui manyi”，《滿語研究》*Manyu yanjiu*，2，哈爾濱 Harbin：2014，頁 17-23。
- 寶懷永 Dou Huaiyong，〈論唐代避諱字形的區別性〉“Lun Tangdai bihui zixing de qubixing”，《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Zhejiang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53.9，杭州 Hangzhou：2023，頁 104-115。
- 鍾雪珂 Zhong Xueke，〈《滿漢合璧音注成語對待》的注音性質及價值——以與《兼滿漢語滿洲套話清文啟蒙》比較為中心〉“*Man Han hebi yinzu chengyu duidai de zhuyin xingzhi ji jiazhi: yi yu Jian Man Han yu Manzhou taohua Qingwen qimeng bijiao wei zhongxin*”，《古漢語研究》*Gu Hanyu yanjiu*，1，長沙 Changsha：2026，頁 145-156。
- 辻正博 Tsuji Masahiro，〈唐代寫本における避諱と則天文字の使用——P.5523 recto の書寫年代について〉“Tōdai shahon ni okeru hiki to Sokuten monji no shiyō: P.5523 recto no shosha nendai ni tsuite”，《敦煌寫本研究年報》*Tonkō shahon kenkyū nenpō*，10，京都 Kyoto：2016，頁 437-448。doi: 10.14989/DunhuangNianbao_10_437
- 河内良弘 Kawachi Yoshihiro、清瀨義三郎則府 Kiyose Gisaburō Rorukura 編著，《滿洲語文語入門》*Manshūgo bungo nyūmon*，京都 Kyoto：京都大学學術出版会 Kyoto daigaku gakujutsu shuppankai，2002。
- 宮崎市定 Miyazaki Ichisada，《宮崎市定全集》*Miyazaki Ichisada zenshū* 第 14 卷，東京 Tokyo：岩波書店 Iwanami Shoten，1991。

- 崔鶴根 Choe Hak-kŭn, 〈滿洲語의 格, 性, 數에 對해서 : 滿洲語文法 (其二)〉
“Manjueo ui gyeok, seong, sag’e daehaeseo: Manjueo munbeop 2”, 《語學研究》
Eohak yeongu, 12.1, 首爾 Seoul: 1976, 頁 1-16。
- Adamek, Piotr. *A Good Son Is Sad If He Hears the Name of His Father: The Tabooing of Names in China as a Way of Implementing Social Values*. London: Routledge, 2017.
- Beatrice, Bartlett. “Books of Rev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rchival Record Books for Research on Ch’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6.2, 1985, pp. 25-36. doi: 10.1353/late.1985.0000
- Hauer, Erich. *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 2., durchgesehen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herausgegeben von Oliver Corff*.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
- Kim, Kwangmin. *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Redwoo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Kind, Kevin. “Musulman Knowledge, Local Hist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Qing Nation-State,” *Late Imperial China*, 42.2, 2021, pp. 91-135. doi: 10.1353/late.2021.0007
- Saarela, Mårten Söderblom. *The Manchu Language at Court and in the Bureaucracy under the Qianlong Emperor*. Leiden: Brill, 2024.
- Schluessel, Eric T. “Language and the State in Late Qing Xinjiang,” in Birgit N. Schlyter (ed.), *Historiography and Nation-Building among Turkic Populations*. Stockholm: Swedish Research Institute in Istanbul, 2014, pp. 145-167.

The Manchu Naming Taboo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Lingxiao*

ABSTRACT

The naming taboo (*bihui* 避諱)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carried not only speci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strong political implications. Unlike the dynasti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such as the Han, Tang,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Qing court enforced taboos not only on Chinese characters but also on the Manchu names of its emperors.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naming taboo system focused mostly o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paying compar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Manchu naming taboos in the late Qing. Using Manchu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Manchu naming taboo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fter the Xianfeng 咸豐 reign, as the Chinese naming taboo system entered a stage where “After the Xianfeng 咸豐 reign, Chinese naming-taboo practices entered a phase characterized by “the avoidance of the second character” (erming bu pianhui 二名不偏諱), and Manchu naming-taboo practices likewise entered a new stage.”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and mid-Qing periods, the late Qing Manchu naming taboo exhibited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graphic form of tabooed characters, a narrower scope of avoidance, and a weakened degree of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practice. Thi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fact that the pluralistic rule maintained by the Qing court was facing threats and challenges.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Manchu language, naming taboo system,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收稿日期：2025. 4. 5；修正稿日期：2026. 1. 16；通過刊登日期：2026. 2. 23)

* Postdoctoral Fellow,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address: zlingxiao93@126.com

